

讀者投書

可能還要加價 定閱務請從速

讀「論程子孟明案」後(一)

編者先生：在「觀察」三卷二十四期

上讀到尊文「論程孟明案」一文。該文最後兩段使我想提筆給先生寫幾句話。那篇文章題目中的「有心人」三字很刺眼。我首先說：在現在中國，一個習法律又執行法律職務的人，如果他還「有心」，便會有過人的痛苦。我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畢業後作司法官已經三年多了。只因我還年輕，又還「有心」，因此時時在痛苦之中。「行憲」本是我們作司法工作的人應該高興的，但在今日，「法治」「憲法」，在我看來，只是對我們的一種諷刺。「司法獨立」，多麼好聽？民國初年還有一「司法獨立」，但「訓政」之後便沒有了。這固然也可以歸咎於少數司法官的沒有骨氣，但現在社會上還有幾個人有骨氣？又如何能叫人還有骨氣？不久前，為上海地檢處傳訊了一個現任縣長，命之取保，行政院竟來了「訓令」，訓了一番。以小喻大，還說什麼「司法獨立」呢？

我現任××××××，我對程孟明案很清楚。憑良心說，我們也有人認為程孟明做得對，法院的判決是「違心之論」。但我們是現任公務員，一個現任公務員如果願想到「懲戒」(種種色色的)，便不得不做些「違心」之事。但你可想得到，就是這樣，我們法院中已經就一風風雨雨

一，有人被注意為「搗蛋」了。程孟明的作法，在英美是家常便飯，即在日本也不了不起了，但在中國便是「神經病」。因為凡是認真而不甘隨波逐流的人，在這個社會上，將常常被人目為「神經病」。

我不應該發牢騷，我的原意還是想對你在那篇文章中最後的一點意見說幾句話：(一)你提出的一個意見很好，我也早有此意。不過我比你悲觀些，我沒有在這個社會中發表這種意見的勇氣。你希望律師界有人作這事，我看不容易。我倒寧願新聞界文化界有人來幹一下。

(二)以後「行憲」了，我只希望新聞界文化界多注意「違憲」的事。遇有「違憲」的事，報紙用頭號新聞登，雜誌用第一篇文章寫，那也許可以叫人注意。(三)真正有了你所謂「有關大原則」的事，我想必定有「有心人」願意出來合力進行。問題是「有心人」彼此之間有無聯絡？譬如「禁舞」一事，根本也是違憲的，而舞業中人，雖然表示反對，却没有抓到要害，他們不大懂得法律，終於失敗了。所以有法律知識的人，碰到這種事情，應當挺身出來，幫助法律知識不夠的人。 ××× 二月八日 上海

讀「論程子孟明案」後(二)

編者先生：讀了先生所寫一論程孟明

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情一文，我也有點感想。程孟明律師的控訴所代表的精神，先生已經分析得很清楚，凌元慶推事的判決所代表現在中國政治的特點，我想評論評論：

(一)我們相信凌元慶推事對李進祥局長和程孟明律師均無任何恩怨，至少對於本案的判決是經多方考慮而不是憑一己偏私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這個判決的後面，却有着支配這判決的另外一個

力量。

(二)現在的司法界，遵從國家的法律，不如順從政府的意思。順從政府的意見而違背了法律，沒有關係；假如遵從了法律而違背了政府的意思，恐怕法官的位置就要發生問題了。

(三)命令不能變更法律；立法原則也不就是法律，這是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的。右道憲法公布施行的今天，竟有此不合法的判決，可見得憲法公布施行以前與憲法公布施行以後，並沒有甚麼兩樣。這說明我們國家距法治的境界還遠。記得民國三十四年重慶地方法院審判高秉坊貪污案，案件重大，根據法律判處死刑，某要人從國外趕來，將審判推事遷調邊疆，原案發還更審，改死刑為徒刑。名義上是遷調邊疆，其實何嘗不是等於專制時候處罰充軍。殷鑑不遠，而且這樣的事件發生很多，誰又肯拿自己的飯碗冒險呢？司法不能獨立，除人事原因而外，制度也有毛病，可是現在的輿論聲音太微弱了，老百姓有甚麼力量，司法人員又有甚麼辦法？ 張平 二月十一日 江灣

讀「論程子孟明案」後(三)

編者先生：讀「觀察」第三卷報告書

和「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後，感慨良多，願一述所感，就教先生。

先生說：「在今日中國，無論那一地域，那一階層，那一職業，那一年齡，都有不甘自棄的有志之士，憑其熱血，希望把國家弄好」。不錯，有這一批人，但是這批人在社會上却沒有什麼表現。這是什麼道理？我以為是缺乏勇氣，雖有正義感而卻沒有勇氣把正義感表達於外。這實在是可悲的。

所以缺乏勇氣，一因中國傳統思想好講中庸之道，所以人都不走極端，二因統

治者的「格殺打撲」，使大家難於出頭，三因社會缺乏正義的力量，沒有公道和同情。前二者還是次要，最後一項影響尤大。試想，你鼓足勇氣，決心與一切不合理的、不合法、不公平的事情拚鬥，企圖為社會為人民爭取一點公道，但是人們不但不同情，不支持，甚或冷諷熱嘲，挖苦謔笑，因而使人感到寒心，以致心灰意冷，原有一點勇氣也因之失却了。

然而就因為這個社會不公道，不合理，所以要爭取，要奮鬥。對程孟明律師爭取法治的精神，先生為文推崇讚揚，也就是給程律師一種精神上的支持。這種事情是我們大家應當做的。我常感慨地說：「我現在是一個無名小卒，人輕言微，撕破了喉嚨，大聲叫喊，也不會發生什麼作用。但是像某些有地位有聲望的人，他們為什麼不站出來替人民講幾句話？為什麼儘是說些不關痛癢的話，而不喊出人民的心聲？難道他們真把個人的身家性命看得比什麼都重？一要為社會爭一個真是真非。就要有不怕死的敢說敢言的人。其實，有些人出來替人民說話，不一定就會因此喪命的。只有無名小卒如我者，可能「自行落水」或失蹤。真正在人民心目中已有權威的人，統治者雖恨之入骨，也不敢過分。

先生說：「在這大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為言論而犧牲生命的人物」。我覺得中國患在聰明人(明哲保身者一流在內)太多，而傻子太少，中國實在需要一批攪勁十足的人來幹一番。

我希望先生鼓勵一切愛國家愛人民有血有肉有正義感的人們，拿出勇氣來，向惡勢力挑戰，為大多數的受壓迫的被剝削的苦難同胞努力。要號召所有不謀個人名利，不計個人毀譽的有志之士，為社會爭公道，為人民爭自由，爭平等。

崔×× 二月十二日 上海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錢克新：北平朝陽學院教授
劉子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處秘書

江沙：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鍾書：著作家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

張東蓀

本篇是我在本刊上期所作「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文化的自由主義」一文的續篇。因為尚有未完的意思，所以才寫出來以作補充。凡前作中已經提到的，在此即不再說。希望讀者合併觀之。

言論對於現下時局的需要本有兩種。一種是建議式的，即對於當前局勢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例如怎樣可以停止內戰等。好像論壇上這一類的文章漸漸少了，甚至於無。我個人亦不願再做這樣的文章。另外一類是分析式的，即把若干概念與若干問題分析得清清楚楚，俾將來實現起來不致於歪曲，即不致鬧亂子。我認為這個工夫實在需要得很。尤其是對於知識青年們，有些已在社會上做事，有些雖在在學，不久亦將入社會。如果他們對於這些概念不有清楚的認識，不能說是沒有危險的。

現在我要討論的就是經濟平等。因為近來論壇上討論這個問題甚熱烈。而我總以為他們沒有見到問題的核心，只是流為空汎的文字把戲而已。須知經濟平等不只是戰後為然。何以戰後會來得這樣迫切呢？顯然這其間另有一個戰後問題存在，並非單純的不平等的原則在那裏起作用。又須知戰後的問題是個活的問題，急迫而又切實，斷非僅由於空汎原則之故。戰後各國經濟因經過破壞，要求恢復生產，並由此而提高生產，——未經破壞者雖不必恢復，然亦希望提高。恐怕這是一個共同的課題。只是各國須依其環境與特殊情勢來謀解決。所以我提出「生產」這一個範疇加入於自由平等兩範疇中，來合併計算。即自由平等決不可有虧於生產。如果自由的分量足以使生產受惡影響，那便應將自由作合理的相當限制。平等更必須如此。所以在自由方面以個人主義放任經濟作基礎的舊式自由主義是不適用了；同樣在平等方面烏托邦的社會主義亦是應在屏棄之列。這些在我前作中已提及，今不必多說。

現在單討論經濟平等，我願告訴大家：倘便把經濟平等當作遙遠的理想與抽象的原則，這是絕無問題的。倘使當作目前實踐的指導方針，我敢說現在全世界中，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亦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主要的關鍵在於當事的主體是產業落後的國家。本來照馬克斯的說法，嚴格來講，是封建之後有資本；資本之後有共產。而今天這些產業落後的國家才從封建脫出，即跳入於社會主義。這樣的跳了一級（即躐等）乃是問題所由發生的根本。須知生產的要件之一是財富的累積可以變為資本以從事再生產。資本主義的國家雖則其資本屬於私人，然而幸有所累積可以從事開拓，所以生活能得提高。一班落後國家的問題並不是如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實在同時亦患寡。所以這樣的國家要走上社會主義必須把寡與不均同時解決。在不違背社會公道的限度內，有些國家還得保留若干資本主義的形式，用以獎勵生產，這恐怕就是施復亮先生所說的新資本主義，假使我無誤解的話。如果只解決不均，則惟有高度的資本國家方能辦到。落後的國家要增加生產，首先還是打破封建，推倒專制。倘以為不患寡，不患貧，而只求平，求均，必定使其社會改革站不住。所以落後國家不可忽略這一點，否則其結果決站不住。這是歷史給人類的一個寶貴教訓。為甚麼落後的國家反而急於要採取社會主義呢？這個緣故便足證明社會主義的目的並不是僅僅在乎講均富。社會主義對於人類生產過程有一種看法：就是以為患不均與患寡乃是同一病症。正猶一個人患胃病一樣，必致全身瘦弱。所以去不均不是手段，而患寡為多是目的。換言之，即以爲只有用社會主義方能增高生產。可見生產原是社會主義本有的涵義。以前各種社會主義者不注意於此點，迄至馬克斯出，此義乃大明。

社會主義對於這一點的辦法，就是廢除剝削。廢除剝削在表面上好像是屬於消極方面的，而其實在本質上就等於經濟平等。所謂經濟平等亦就是廢除剝削，不必再講更進一步。並且須知全世界所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能有成功的亦只是做到廢除剝削為止。老實說，廢除剝削是一件極難極難的事。除了蘇聯以外，任何施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沒有完全做到。

所以即就廢除剝削亦未必能一躍而躋，又何況經濟平等呢！證以馬克斯主義的說法，本來就不主張空想的經濟平等。馬氏以為工資有高低反而正是平等。恩格斯更有言曰：「所謂平等只是指廢除階級而言，越過此義即不合理」（原文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proletarian demand for equality is the demand for the abolition of classes. Any demand for equality which goes beyond this, of necessity passes into absurdity. Anti-During）、須知他們所謂階級就是以剝削關係而分的。所謂有產階級只是剝削階級；無產階級只是被剝削階級。倘不依剝削而僅以財產的有無來定，這決不是他們的真意。所以以為最好廢棄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名詞，而專用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兩名詞，這樣便不致引人誤解，而意義反為正確。因為我看剝削有兩種：用他們的術語是封建的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剝削。若用我的名詞則為專制政治的剝削與資本經濟的剝削。前者是以政治力量而壟斷經濟以形成壓榨，後者只以經濟勢力影響政治以便於操縱。前者是專制政治與封建社會的情態；後者只限於資本主義成熟的國家為然。中國的情形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所謂官僚資本等等都是由政治上特殊地位而始造成經濟上的特別力量。在這種狀態裏，尤其應以壓迫與剝削來劃分階級。單純以財產的有無與多寡來決定乃是不行的。所以落後的國家由封建而一躍即到社會主義，其所行的不是以經濟革命為主的社會革命，乃必是以政治革命為主的社會革命。

至於何以必須廢除剝削？第一是因為不公平。第二是為有虛耗（即浪費）。不公平不僅是不合理，同時亦妨礙生產的增加。虛耗更是生產提高的阻礙。二者本是相連的，不過在專制封建是不公道甚於虛耗；在資本主義是虛耗甚於不公道。按不公平的反面是公道，即英文 Justice。此字不宜譯為正義，而宜譯為「應份」，或「應該」，其反面是不應該。應份是由平等而來的，但與平等有些不同。查西洋政治思想史，當知社會主義之發源就是由這個應份的觀念所激起，並非直接出於平等的觀念。須知不平等固然是不公道，但有時嚴格的平等亦會產生不公道。

在專制封建的狀態下，不公道是由政治的勢力、即憑藉武力、而造成的，不完全像資本主義純由吸取剩餘價值使勞動者困於勞動錢則那樣的。所以要推翻這個不公道，在落後的國家便有兩重的任務。一個是如何從封建專制而脫出；一個是如何增加生產。我在前作中亦曾提到，要增加生產必須先去掉其障礙，而專制與封建正是其障礙。所以這樣的兩重任務却是只連為一件事。不過這其間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就是因為用藥有些不同。對於專制封建的病症要醫治莫妙於用個人主義這一劑藥。我名此為個人主義的文化。就是養成個人的自尊心，個人的責任感，對於任何權威，無論在思想上或在實力上，不能無故低頭，而充分保有精神上的自由。這也就是普通所謂自由主義，但一班論者把自由主義認為是用平和手段來改良的，這顯然抹煞了其文化上的功用。必須吃下這一劑藥去，方會把整個的民族從專制封建中拉了出來。這却不是甚麼改良主

義，又與用平和手段無關。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在這一方面是有長久貢獻的。不過在他方面為了迫切的生產增高的要求，如果仍用個人主義從容不迫地做去，不但造成資本主義又演為另一個形式的「不公道」，並且在資本主義的國際形勢包圍中（資本主義發展到後期一定向外求發展，以經濟力壓倒其他後進民族）亦一定不許落後的國家仍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趕上前去。所以落後國家對於生產要求一方面要用樊弘先生所提倡的集體勞動乃是當然的。換言之，即集體勞動又是在這一方面的一劑良藥。現在的問題是這兩劑藥如何配合調勻。要使二者調和，必先加以分析，以明其中有無矛盾。樊先生只看見後者，而忽略了前者。所以說他過於簡單了。須知這個問題並不是原則上抽象的自由與抽象的平等有無矛盾與衝突之問題。一班論者誤以為是自由與平等之關係的問題實是錯了。無論這劑藥是如何來吃，而其結果總是使社會翻身。所謂社會革命即翻身之謂也。在我看來，這兩劑藥調勻在一起是可能的。且其間還有一個天然的分界。詳言之，即使社會翻身到某限度為止。在限度內生產反可以增加；反之，過了限度必致生產受影響，弄成降低。這個標準就是其限制；同時這個限制就可定為標準。這是事實使然，並不管人們主觀上願意與否。倘使不顧這個事實，而硬要試驗，無不失敗。現在歐洲要實施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再嘗試一下蘇聯初革命時的戰時共產制的滋味，便是一個例證。不要以為人類不能利用已往的經驗啊！

根據這個天然的限制之存在，我們便可在擬定制度上使兩方面有相當的配合。須知各國的情形不相同：反動的勢力有大有小（即革命對象的根底有深淺）；生產原有的水準有高低。所以這個天然的界限在各國亦不會是一律的。反動勢力強的便須要多推翻，否則不必要無謂的犧牲。生產原狀太壞的宜加以顧全。我前答樊先生文中提到「斟酌損益」，實即指這些而言。換言之，各國須依其本國的國情而摸出這個天然存在的界限來厘定之，方可符於實際，而不流為主觀主義。我們應得知道一個社會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實由於在客觀上有一不得不的情勢，非由於人們主觀的願望。正好像潮水決堤，誰也擋不住，如無此潛勢，而妄想掀起變化必失敗。這個不得不的情勢如何造成，雖由來非一日，但其中那些地方出毛病最厲害便是那些地方先要求改變。倘其中還有未大出毛病的部分，則千萬不必連帶去推翻之。最出毛病的部分就是最失去公道的部分；倘未大出毛病的部分如果加以翻身，必致反而有虧於公道。公道就是一個標準。用舊日慣用的一過「與」不及「兩名辭來講，歷史上就有先例。例如中國的辛亥革命是不及之例。雖改成民國之名，而未舉共和之實。俄國革命後又被迫而退到新經濟政策這證明當時是太過了。又如巴黎公社的曇花一現，此即過之弊例。中國的太平天國主義亦是因生產不足而致站不住，歷史上過的例較多，足證人們容易衝動。要摸出這個事實的界限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僅少數人了解是不行的，而要大多數人都明瞭却是難得很。稍一不慎即流於感情用事。所以必須充分崇尚理智，以理性為指導，方有希望。這是關於

實際的，須要向實際求教訓，不是空汎的公式所能解決的。須知呆板的三段（即封建，資本，共產）已早爲事實證明其不然了。落後國家從封建脫出，要想生產，反而不能全用資本主義。所以大家須用清醒的理智一讀歷史的教訓。一說到理性，當然要連及指導。但中國知識階級大半是甘於受「力」的指導，或「人」的指導，而不甘受理的指導。我却以爲只有真理能領導人們，人與力並不能是真正的領導者。中國知識階級的墮落是大有影響於國運的。希望以後知識分子凡事須換一副眼光來看。

最後不妨重複說一下。社會主義真正所企求的是廢除剝削。這是基於公道。因爲公道與生產二個概念根本上是相合的。惟由於社會有公道，則生產力可增加。倘使在公道尚未實現以前即提出平等，恐不免要陷入空想的社會主義之危險。因此我以為今天討論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有無衝突的問題，至少有三

評對國際現勢的一

(一)

一月十一日，獨立時論社發表了一篇周鯁生先生的大作，指明今日關於對德對日的和約問題，在根本上已經不是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是在如何扶持及利用這兩個戰敗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因此，周先生擔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將要重演。可是他認爲外交協商的途徑迄未閉塞，所以他主張聯合國的列強應當一致貫徹戰時所標榜的消除侵略勢力的根本政策，以訂立並執行對德對日兩和約。三個星期之後，胡適之先生便寫給周先生一封信，竭力爲美國洗刷，認爲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並以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蘇英法，一九四七年四月馬歇爾在莫斯科又重行提出，兩次都被蘇聯打消了的「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四十年協約草案」爲證。因此，胡先生認爲戰後的蘇聯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國內的輿論相當引起衝動。青年黨主席會琦首先在一月二日的病中談話裏，列舉十點事實，證明胡適之先生認爲蘇聯已變成一個很可怕的勢力一完全正確（見二月三日南京中央日報）。接着，北平的英文時事日報（The Peiping Chronicle）又於次日發表一篇社論，題名叫做「對侵略的反擊」（To counteract aggression），從胡氏的論證更進一步主張與其堅持消滅戰爭的潛力，不如亟早對共產主義的侵略予以反擊，甚至我們成爲此一「反擊」的先鋒也足以自傲。

周先生那篇論文，雖經胡先生表示出一個相反的意見，但我們還沒有看到周先生的答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胡先生竟然拋棄了二十多年對蘇俄的夢想

分好像瞎子看廬的故事：兩個瞎子在那裏爭吵，而廬却尙沒有掛上去。以上所說只是對於一些概念與一些問題加以分析，僅有提醒與教育的意義，並不含有建議性質。但從這裏亦可以取得若干教訓。因爲這些分析是把關鍵弄清楚；而所以能弄清楚却由於取得歷史上的教訓。這些歷史上的教訓還是應得寶貴的啊！同時我要聲明：以上所說大概都是常識。常識而能健全就是寶貴的東西。著者深感於今日論壇上的常識有欠於健全，所以不憚煩來說這一套話。我這幾篇，自信在邏輯上都是貫通的。至於詳細的方面，近來擬着手寫一書，（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主要在於說明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只是民主主義的後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爲二者對立，且有衝突，乃是錯過的；同時要說明經過歷史的教訓，社會主義者已早將若干不切實際的地方自行刪去了。希望此書於今夏能與讀者相見，得就正於有道。

二月十二日

種論調

錢克新

最後不能不惋惜到後者被看作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如果我們看到美國援華步驟加強之後，蘇聯即有新任駐華大使的傳說，可知後者仍然在爭取我國的友誼。蘇聯這個外交步調，只要對最近的國際形勢一加研究，當可知道，她的目的乃在對付對日和約的任何單方行動的趨於極端。我國派駐遠東軍事法庭的檢察官向哲濬，曾於一月二十九日宣佈關於日本頭號戰犯嫌疑犯二十名自巢鴨監獄可能釋放的消息，而且向氏更稱此舉不致影響到我國政府引渡其中任何一人至我國法庭受審。如此看來，我們此時如果驟然斷定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來抵制蘇聯，確然還是一個無益之舉。我們苟不加辨別，自亂外交的步驟，可能反受第三者的愚弄，結果遭到「雅爾達」危機的重演。世局既然演變到如此地步，我們深信決不能再弄亂我們的視線，對胡先生那個見解是應當作進一步分析的。

(二)

美蘇的對立，是一個母可掩諱的事實，但她們也絕非不能妥協的。美蘇對立與妥協的焦點，集中在對德對日的政策上。周鯁生先生說得好，聯合國列強爲世界和平定百年大計，眼光要放遠大點，再不可弄巧反拙了！對德日的寬容政策，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爲這樣就可以恢復她們於戰後藏伏地下的侵略潛力而再驅世界入於戰爭。可是我們不明瞭：爲什麼因了防範戰後蘇聯的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就能寬容時敵國的戰爭潛力？如果我們要那麼做的話，那又何必打好幾年的仗而犧牲好幾百萬的生命呢？

如果是一位客觀研究國際政治的人，他爲了要證實北平時事日報論者的結論，必然要對上述那個問題作詳盡的檢討。而我們於檢討時也不得不追述過去

的重要背景。一九四四年春，美國報紙遍傳當時德國中央銀行總裁沙赫特（戰後為紐倫堡軍事法庭判決無罪釋放的三人之一）及其代表團一行，曾於瑞士和當今美國共和黨外交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兄弟阿倫·杜勒斯（Allen Dulles）和另一位向來資助希特勒黨人的紐約希勞德銀行（Schröder Banking Corporation）的某一董事取得接觸，沙氏以對美共同經營德國工業以及允許美國持有魯爾工業大部股東權利為條件，要求構成一個柔性的和議（Soft peace）。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三月，美國檢察總長皮特爾（Francis Biddle），更根據那時華爾街與德國獨佔企業者在中立國家如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根廷等處的秘密談判，發表過一篇詳細的報告，可是無論美國的司法部或是其它的政府機關，都並沒有任何行動來阻止這些談判。從這些線索上可以證明，美國此次的對德戰事本想適可而止的，毋奈以至於那時蘇軍繼續的前進，以及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謀刺希特勒的失敗，才促成了美國打到底的決心。

在這裏，我們也必須說明。究竟美國為什麼要在珍珠港被襲之後，同時要向德日兩國宣戰？如所週知，在美國參加二次大戰以前，德日二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軍火與原料的顧客。只有愚蠢的日本軍閥才會上希特勒和李賓特洛甫的當，昧然以「英雄自居」向美國首先開戰。我們不難回憶，那個時候正是德軍長驅直撲蘇聯國門的時候，納粹主帥深信勝利在望，所以不願再給人家偷雞。可是美國為什麼終於要對德義宣戰而進軍西歐呢？當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爲了要一洩「魯爾之憤」！原來遠在一九二四年，美國的狄龍李特（Dillon-Reed）財團就決定了購買德國全部魯爾地區的鋼鐵工業，使之組成「聯合製鋼廠」（德國製鋼脫辣斯），一個包括對克魯伯，蒂遜，史丁納斯和其它鋼廠證券控制的龐大獨佔公司。美國財閥在國外投資的冒險，確然使他們感到沒有在國內那麼的安全。因爲在國內，兩大財閥（摩根與狄龍李特）仗着他們的金錢魔力，所謂共和與民主兩黨不啻被其玩弄於股掌之上，但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却不是這樣。那時德國雖由社會民主黨執政，蘇聯却正贊助着一個日漸強大的德國共產黨，後者且持有德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狄龍李特財團的一員哈里曼公司，以前既然會被蘇聯一度愚弄，對俄國錫鑛作金錢與機械配備的投資，結果却以未許蘇聯政府握有一集體的股份」和哈里曼代表發生衝突，因而被撤銷「許可」而把全部投資充公。因之他們在那時也深怕一旦俄國幫助德國共產黨獲取德國政權之後，也許要在德國對狄龍的魯爾投資做出同樣的事，所以狄龍李特很快就在德國尋到另一個政黨——即納粹黨去抵消它。不料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一朝身登大位手握德國政權後，狄龍對於其魯爾投資的免稅者望始終成爲夢想，雙方會發生不少的齟齬。直到最後，狄龍的魯爾公司却以納稅未清，被強迫售給了德國政府，並更名爲「漢曼·戈林製鋼廠」。從此以後，在華爾街的財閥對於希特勒，懷有着一種強烈的復仇心理。當白宮當局對日宣戰的時候，當然是他們唯一的復仇機會了。勝利之後，

美國刻不忘懷的便是一個如何囊括魯爾的問題。而對於舊時敵國的戰爭潛力，是否必須要壓制，或甚至消滅，却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

(III)

胡適之先生特別提出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由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蘇英法三國，而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再由馬歇爾在莫斯科會議中重行提出的「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二十年協約草案」，他相信這便是美國要維持集體安全的武力來長期制止德國侵略勢力復活的明證。他並說，當初美國政府曾表示，同樣的協約可以適用到日本。關於後者，現在還沒有公表的文件或具體的方案可據，我們姑先不談。但是論到美國對德的那個四強共同制止武裝的二十年協約問題，胡先生說兩次都給蘇聯打消了。關於這一點，我們應進而研究，難道反而蘇聯願意讓德國重行武裝嗎？

單是解除德國武裝，不是防制德國再起的一個頂好保障。在波茨坦宣言列舉「佔領德國之目的」的時候，曾經列出下面四個原則：（一）解除德國全部武裝，使完全非軍事化，或剷除可用以作軍事生產之一切德國工業；（二）使德國人民確信軍事上已完全失敗，並控制逃避他們自行加諸本身的責任；（三）摧毀國社黨及其附屬及監督之機構，必須解散一切納粹組織，並確保此等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復活；（四）準備使德國政治生活得於民主基礎上獲得重新建立。我們再按照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更知佔領德國的主要目的，乃在「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要確保德國決不能再擾亂世界和平」。所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單靠解除德國武裝是不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教訓，至今我們還不能有所遺忘。基於這個理由，要防制德國侵略勢力的再起，波茨坦會議曾決定了解除德國武裝之外，還要從經濟上摧毀德國軍國主義的基礎，從政治上剷除德國納粹主義的根源。如果德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仍被保留下來，那末縱然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把德國的武裝完全解除了，也隨時可以重新組織起來的。

美國所提出的四強公約草案，僅僅規定：德國接受了這章約中德國不得有軍事組織與軍事計劃的適當條款以後，對德國的佔領即行終止。這顯然違反了波茨坦的決定，也違背了克里米亞的精神。原來這一公約所包括的內容，主要是根據范登堡和杜勒斯的計劃，它的遠景就是復興德國，作爲西歐集團中的一個部分，貝爾納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在斯圖德特的演說，早就證明了這一企圖。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妨再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當皮特爾（Francis Biddle）於一九四五年三月的報告中，宣露華爾街通過中立國家舉行許多秘密談判的時候，我們就不難明白美國的財閥乃是如何地歡迎德國資本家的合作，以恢復國際的卡迭爾（當然這個獨佔組織該是由美國來控制的）。當在戰場上雙方還在流血的時候，美國的國務院自然不願馬上把這個由美國控制的德國獨佔企業復興計劃加以公表，但我們相信美國政府的

智囊團，恐早已認這個復興計劃為戰後經濟穩定的主要條件了。在這裏，我們雖沒有直接的實證，但也能提供幾件事實來做間接的證明。在歐洲戰事快要結束的時候，那時蘇軍朱可夫和高涅夫兩支軍隊已從德國的東北與東南方面迅速地向德國心臟進攻，美國在最後的一個作戰星期中，曾不惜大量轟炸東德的城地以助蘇軍作戰，以至大部的工廠被毀，而在西德尤其魯爾方面，則在德軍投降的時候，百分之七十五的工廠還依然絲毫未損。事後據盟軍專家的調查，在西德被炸的四十五處工廠中，只有三處完全炸燬，而其它各廠僅炸毀了百分之十至三十的程度。所以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日內瓦日報」(Journal de Genève)曾經說過，西德的工業如果能供以勞動與原料的話，在數月間就可以恢復一九三八年生產水準，甚至加以某種程度的改善之後，且能超過那個水準。

自從美軍佔領德境之後，美方軍政府立即下令禁止西德工業國有計劃的復活，對於大多數的德國工廠強令和美廠家合夥，以便剔除於賠償計劃之外。數月之後，美國佔領當局不願解散德國舊有的卡迭爾以便保存德國戰爭工業潛力的意向，即漸明顯，於是德國的資本家就想重溫戰爭結束前沙赫特的故智。沙赫特那時正在紐倫堡受審，這一幕戲是由另一位德國工業家來演出的，這個人就是首次戰後力主德法合作以建立防蘇安全地帶的萊希堡(Reichberg)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中，萊氏曾向美軍當局上一條陳，主張由西歐國家與德國結成一個集團，一方面挽救德國的經濟，一方面又可防制蘇聯。在這個建議中，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乃是廢止波茨坦決定中的生產賠償條款，而代以一種新的賠償與經濟原則。按照這個原則，今後德國的生產貨物，將完全以之作爲西方國家與德國實現經濟統一之用。這樣的獻計，當時雖未見美軍當局的如何採用，但從事後杜勒斯所發表的歐洲復興計劃中，就可以看出這個獻計的效力！美軍當局那時擱置萊希堡計劃的實行，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這個計劃的實行乃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破壞四強的合作。魯爾既能作爲復興歐洲的核心，因此美國政府的智囊團就首先考慮一個以英美合作來打擊四強合作的詭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所成立的英美大借款，就是這個詭計的開端，美國利用英國戰後財政的弱點，來逐漸做成其排除英國獨佔魯爾的基石，結果引導到英美佔領區的合併。

從上面這些事實上，我們足以證明胡先生所說蘇聯拒絕美國四強防德公約的建議一節，爲如何的危險。我們如果對過去活的歷史再加一度的檢閱，當知蘇聯雖然在一九四六年拒絕討論貝爾納斯的建議，但在去春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她卻並沒有拒絕討論這個公約，她只是提出了六項修正。這些修正足：(一)公約中要提到德國的解除武裝與肅清納粹；(二)規定四國共管魯爾；(三)消滅德國的大企業；把它們的資產轉移給德國國家；(四)規定土地改革辦法；(五)建立德國的民主制度；(六)四強同意決定德國賠償、消滅戰爭潛力與建立民主等目標完成之後，然後中止軍事佔領。當時美國方面認爲除了

第一項修正之外，其它概爲英美所不能接受！在這裏，我們並不要爲蘇聯辯護，但事實至爲顯明。

(四)

胡先生第三個觀察，他講所謂「防制德日的復興」，應該解釋作盡力防制這兩國的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活，這裏並沒有不許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意思。我們相信如果世間的人都是那麼和胡先生一樣誠實，那末他這句話還有點正確。毋奈以首次大戰以後的情形來作證的話，我們儘可發現許多慈善偽裝的事實。最顯著的舉例，譬如，首次戰後的降偉斯計劃(Dawes Plan)表面上爲減輕德國賠償的重負，而使德國經濟復蘇，實際却是英法美三國使德國參加其共同反蘇陣線的條件。基於這樣的經驗，這次戰爭結束以後，美國著名的政論家李浦曼(Walter Lippmann)早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就在紐約講壇報上連續地寫過好幾篇文章，辯明美國如須增加其對歐的壓力，她必須鞏固其東部地中海的勢力。他以此爲這個行動，將對全部德國與歐洲問題予以最好解決的機會。他並且要求美國的外交家應與英法兩國成立關於魯爾的協定，以作爲全部德國問題解決的出發點。因此，李氏喊出了一個新的歐洲降偉斯計劃的呼聲，在他的心目中，美國的前進線已自東地中海一直擴展到歐陸中心，這不僅爲戰略所需，亦且爲建築美國至上的政治必然形勢。李浦曼這個夢想，在去年的杜魯門主義中已經如願以償了。同時這也就是杜勒斯希望把魯爾工業潛力作爲西歐集團經濟基礎的另一種說明。我們推其目的，不外想利用德國優良而低廉的勞力，以造出較低於美國國內價格的貨物，而在美國的援歐計劃下，售取美元。

馬歇爾在去年莫斯科會議的時候，就已經說得很明白。他說：「我們需要德國利用其本國的優良人力資源，工業的動力與能力，再度造成歐洲繁榮所繫的貿易網」。這是很顯明的，馬歇爾的對德政策，想以貿易作爲其重點，而使德國的資源不爲其本國復興所用，却反以之便利美國推進歐洲國家的商務。我們不難回憶，馬歇爾在去年莫斯科會議時，曾拒絕蘇聯要求把德國鋼鐵生產水準提高至每年一千萬噸至一千二百萬噸，目爲此舉無異增大了德國工業的戰爭潛力。可是到了數月後所召開的英美法會議中，美國却提議提高德國的鋼鐵生產至一九三六年的水準(即年產一千六百萬噸)，而結果因爲法國的反對才決定按照一九三六年的水準，提高到年產一千一百萬噸。這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也不是爲了適應德國和手工業的需要，馬歇爾自己在莫斯科所說的話就可作爲反證。所以有人說，美國通過了馬歇爾計劃，已將西德做成其歐洲戰爭潛力的橋頭堡。

我們只要看看自從英美佔領區合併之後，德國的工業生產品怎樣被英美做成其榨取的對象，就可以明白這個與胡先生所心嚮往之的「自給」效果乃有多大的距離！

現在雙佔區的出入口貿易，統統由英美聯合對外貿易局 (JETIA) 來統制的，所以後者就好像是德國輸出商與國外購買者之間的中間人。它自德國生產者收購貨物，而自國外的入口商收取現款。但是這種收款不僅有各種貨幣的不同，而且價格也有不同。它自德國生產者方面收購貨物的時候，所付價格往往就像過去希特勒時代有一定的國內限價 (Inland Ceiling Prices)。這個國內限價，當然和普通的市價相差甚遠。譬如拿煤價來說，在那時即僅值市價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現在雙佔區的對外貿易局，就用這個低價去收購生產品，且付的是馬克，而向英美轉銷的時候則收取美元及英鎊，甚至轉銷於比法及瑞典的時候，還要求一個更高的價值！我們現在就拿煤來說，根據去年英方公布的價格，魯爾的煤，世界的市價為每噸十元五角美金！而雙佔區的聯合對外貿易局，却以十六元五角的馬克來收購（這等於五元半美金），因此他們對每一噸的煤可以榨取五元美金。我們知道，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的整整兩年內，魯爾煤的輸出量共達二千萬噸，讀者就不難計算其所獲的利益了！除了煤之外，其它任何貨物都是一樣，即如萊加 (Leica) 牌的攝影機也都逃不出這樣的榨取。現在美國要拿三百元美金或甚至五百元美金才能買到一架萊加照相機，但是德國的國內限價僅為三百二十一馬克（等於一百另七元美金）！

不僅這樣，雙佔區的對外貿易局還有一個更好的獲利方法。按照雙佔區當局的規定，一切德國貨物的輸出，可以拿美元或英鎊來付款，但是對法、比、荷、盧、四國則特別准許其各用本國的貨幣來付款，不過仍照美元的匯率來折合，甚至對某些特別規定的項目，如魯爾的煤，任何國家都只能拿美元來購得。這樣，不啻給英美佔領當局一個絕好的漁利機會。他們便任意變更匯兌率，甚或對特別需要的貨物拼命抬高其幣值。舉例來說，譬如基本的匯兌率，一馬克值美元三角，但其實際的換算率，往往有很大的變動，有的只要二角四分就可以算成一美元，有的却要四角、五角或甚至如醫藥用品要提到八角美金換算馬克一枚。去年比國曾為此事，向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提出抗議，且在其備忘錄中指出：對一般化學用品，馬克與美元的換算率竟高至一元二角美金合一馬克（或較平常匯兌率高四倍），因此德國的化學用品就不易為他國所購買。我們對此事很容易明白，美國要這樣做，只是想以人為的方法便利美國化學托辣斯的榨取！從這樣的方法上，我們也可以完全揭破美國佔領當局假慈悲的面幕了！像這樣的情形，誰還能相信如美國方面所宣傳，她要長期掏腰包來養活佔領區的德國人呢？如果像這樣的榨取方式，所謂保留德國工業生產力的意義，究竟還不幾分是為了要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美國對日本的援助，其結果也是一樣。

(五)

我們根據上面所說的各项事實，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美國與蘇聯並肩作戰，共同打倒希特勒政權，其目的既不是為了要消滅極權政治而恢復世界的民主

與自由；當然也不想和蘇聯平分秋色，在均勢下維持未來的和平。他們真正的目的，只是擴大其戰後資本主義的力量，而鞏固其黃金霸權。所以我們與其和周鏗生先生那樣，顧慮到世界第一次大戰後的歷史要重演，反不如注意到當前美蘇直接對立的形態。第一次大戰後的情形，當然和這一次的不同。其最大的差別，即在於美國成為無敵的海軍國家，因此她的對外政策不再能像過去的一般，採取孤立政策。如果英國在首次大戰後被削弱其世界的地位，這一次却有極大的可能成為美國的頭號附庸。至於德日地下的復興陰謀，即便在美國姑息之下，他們究亦不可能易於達到其目的。理由極為顯明，今日美國即便在頂保守的政治家心目之中，他們的縱容戰犯，提早結束反納粹審判，保留德日戰爭潛力，也不過如孫行者站在如來佛的掌心一樣。誠如北平時事日報論者所說，我們現在不怕戰爭潛力的恢復，但是這個可怕的原因，決非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沒有恢復」的那麼一回事。然而我們在弄清真正的侵略以前，也犯不着唱出「反擊」的高調，更毋庸做「打先鋒」的毛遂自荐。

我們現在所怕的是什麼呢？以筆者的愚見所及，可能有一種危機：一個是美蘇戰爭，另一個是美蘇妥協。前者，毫無疑義地，乃是一個人類自殺的悲劇，我們大可不必再存過去以夷制夷或以毒攻毒的妄想；後一個可能的危險，也決不減於前者。為什麼呢？讓我們來細細說明。

美蘇妥協，不是絕對的一個空中樓閣。隨着蘇聯駐美大使的更迭，華府顯然有點不很平常的外交空氣。新大使潘友新先生，原來就是戰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在他的任中我們曾經看到他的活動能力相當的強。自從他到任後，在年初早遞國書之時，即首先表白蘇方願與美國謀取和平的合作。因此，華府方面就發表談話稱，二年前杜魯門總統於邀請邱吉爾來美作有名的「富爾敦演說」之時，曾同樣邀請史達林至美一同泛舟米蘇里河上而親向美國人民表達其蘇方的意見，但終被拒絕。現在杜魯門還有這個意思，在華府舉行巨頭會議來打開美蘇對立的僵局。當然，史達林不願離開其國境，倒是唯一的阻礙。

可是潘友新大使，在到任快兩月之中，却做出好幾件過去蘇聯拒絕過的事，譬如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蘇聯即照會美方，重新擬訂了兩百億美元戰時租借計劃的解決條款，請與美國締結協定。潘氏曾於本年一月中旬請美方繼續去年七月中斷關於戰時租借清償的談判，而隨即於二月三日照會美國國務院，表示欲將其戰時按照租借法案獲得的油船七艘與貨船一艘還與美國。同時，潘友新大使在一月二十五日首次接見美國記者時，更表示應發展美蘇之間的貿易，以為達到兩國友好外交關係的步驟。他並深信蘇聯雖與美國經濟體制迥異，却比肩作戰，故在樹立和平工作上亦能合作。

到了二月中旬，蘇聯與美國妥協的謠傳更紛至沓來。不是說蘇聯的外交政策可能趨向結束冷戰的試探工作，即稱兩國的談判已在華府或柏林開始，俾結束久懸未決的各项問題。且據瑞士京城激進民主機關「聯合報」駐華府訪員二月十四日的電訊所稱，美國方面準備允許蘇聯在東歐、巴爾幹、北韓自由行

動；但在另一方面美國亦準備向蘇提出下列各項要求：(一) 美國得在希臘自由行動；(二) 蘇聯停止援助希臘遊擊隊領袖馬爾柯斯；(三) 要求蘇聯命令德義共黨減少活動；(四) 要求蘇聯退出東德。

當然，我們現在要判斷美蘇是否能夠妥協固猶過早，但觀於蘇聯過去能對德日簽約以防戰禍及己的往事，自亦不能即斷為虛妄。讀過近代外交史的人，總該明瞭，俄國每一在歐戰的政策遇到困難的時候，往往只是促成她向遠東方面的拓展。如果在上一世紀中葉克里米亞的戰役，會決定其宿命的對歐政策的退讓，那末在九十年後同樣在克里米亞的會議中，我們也不難窺測到今日蘇聯外交可能的命運了。

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起至三十日止，蘇聯曾向美國提出四個抗議：(一) 抗議英美在利比亞重建設時空軍基地；(二) 抗議美飛行堡壘數架在黃海及日本海上空會對蘇船桅頂上盤旋，認係美國在其領水以外企圖獲得各海洋主要控制權之舉動；(三) 抗議美軍艦訪問義大利口岸；(四) 抗議美國在伊朗的行動，指出美軍事顧問現在積極訓練伊軍，並供武器，建築若干空軍基地，其中包括地下機場，改組伊軍事工業，生產美式軍火，且在伊南部建築地下汽油倉

大圈子裏小圈子的日本政局

(東京通信)

劉子健

片山內閣的土崩瓦解

分析佔領下日本近來的政局，首先要解釋幾點基本因素：把大圈子先看清楚。

1. 日本不是民主？

共產黨認為根本不是民主，我們一般的輿論也認為不夠民主。共產黨的批評注重國內，例如天皇制的保留，舊官僚的把持，一般人民的困苦與黑市財主的逍遙，解散財閥、懲罰戰犯、改革農地、提高工資、都沒有徹底執行。我國一般的輿論，也批評到這些問題，都注重在國際關係。認為日本侵略思想未被根除，仍有死灰復燃的危險。但這些批評都錯了。因為除了天皇制是國體問題外，其餘都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政體問題。從政體上來說，日本實行新憲普選，由國會中各黨派產生政府，日本是已經民主了。

2. 日本的政治實質是什麼？

所謂政治實質，就是在民主政體的酒瓶裏面，裝的什麼酒？上面所說的各點批評，其實都是說日本政治，在形式上雖然具備民主手續，在事實上却仍舊沒有把政治權力

庫，美軍官研究攝取蘇伊邊界之地圖，甚至協助伊方在蘇聯邊境建立堡壘。這一連串的抗議，並不足以阻礙現在潘友新大使向美和平呼籲的工作，它只是證明蘇聯對和平的希望。我認爲胡先生所稱的蘇聯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爲「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價」，今後還可能是這樣。胡先生也用不到懷疑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這些是爲了和平所付出最後的代價。然而即使這樣，和平仍然被蔑視！如果現在還有人叫蘇聯付出這些和平代價的話，我們想信危機仍然是一樣。馬歇爾在二月十三日夜間向阿華州「得麻恩」全國農業研究所的演講，就已暗示到，美蘇兩國關係真正解決以前，世界局勢必有「決定性的改變」！什麼改變呢？胡適之先生一定以後又要怪到蘇聯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了！

我們面對着這樣的國際形勢，難道我們蠢得像過去的日本一樣嗎？世界在和平不絕如縷的場合，「突變」是隨時可來的。所貴的在乎外交當局能有先見之明，速爲屈突徙薪之計，否則我們很懷疑國家的命運，是否能在新的暴風雨中再渡過其難關！

(二月二十四日晨)

交在一般人民的手中，而使一切的設施，都以一般人民的福利爲唯一的目標。這問題很難討論，因爲看法不同，標準不同。姑不論其是非曲直，僅就事實而論日本的政治實質，既不是蘇聯所主張的「革命民主」，也不是我國輿論界所期待的「理想民主」，而只是美國政策所希望的一「保守民主」。

3. 美國佔領政策所決定的是什麼？

從美國國內趨勢，外交方針來看，自然要在日本加強反共。但有兩點限制：(一) 反共則可，企圖軍事上重建日本則不許；(二) 反共則可，不按民主的形式則不許。從美國經濟制度來看，當然更要日本繁榮。就佔領當局來看，當然希望「安定」「復興」，作爲他們的成績。由於這些理由，美國佔領政策，在確定民主形式之後，一定要確保「保守」勢力。

澈底解散財閥，完全剷除官僚，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都會使日本經濟一時陷於混亂，而給左翼進攻的機會。現在所做到的是給了工人組織的權利，也給了農民變

爲自耕農的機會。這兩大方針同是民主作風，其影響則恰巧相反；工會增強了左傾勢力，而農民却贊成保守勢力。再加上殘存在政界財界的保守勢力，恰好像「三分天下有其二」，達到確保保守勢力佔上風的目的。工人既有自由，農村亦經改革，政界也略加肅清，外符民主之名，內有保守之實，麥帥真不愧文武全才！幾道命令，大勢早定，你想逃出如來佛掌心！日本政治，只能在小圈子裏轉動！

4. 日本政治分野所表現的是什麼？

美國不能在德國實現「保守民主」，而在日本能實現，並不是在德日兩國的佔領政策有什麼基本差異，只是日本政治，也正巧適合這種政策，而德國却不然。日本人民組織水準低，受矇蔽久，服從性大，封建性深。共黨的勢力本也有限，黨內人才也很少。所謂左翼，例如社會黨的左翼，內部複雜，有右翼國家社會主義轉向的，有一知半解的投機政客，有只知理論的知識份子，而缺乏有經驗有能力的領袖。從日本社會的發展而言，即使美國政策扶植左翼，一時也不會生長成熟。如果參考英國工黨幾十年

來的歷史，那末，日本左翼的機運未至，本也不足為怪！從另一方面來說，財閥舊部，軍閥門生，老政黨的徒弟，舊官僚的黨羽，却是經驗豐富。而且他們有錢。活動能力和活動經費都在左翼之上。玩起選舉，玩起縱橫捭闔的把戲來，都很在行。那末，日本政治是一面倒的保守嗎？這也不然。畢竟舊勢力受了肅清的打擊，受到佔領政策的若干民主形式的限制，受到輿論的指摘，何況老毛病的弱點還很多。而且畢竟工會組織起來，力量自在生長中，其勢力，特別在經濟危局下，絕不能輕視！

整個分野，合起來看是保守勢力佔上風，但不能不對左翼勢力作相當的讓步。吉田雖得麥帥格外支持。例如去年二月雖有麥帥下令禁止總罷工，但吉田仍舊不得不辭職。社會黨於選舉中獲得第一黨的地位，却不能佔半數。組織聯合內閣，終因內部分裂而辭職。這都足以看出日本政局在「保守民主」之下，保守勢力和左翼勢力的消長和平衡。

5. 麥帥是否干涉日本政治？

表面上，盟軍總部並不干涉日本政治。但實際上，這話很難說。在基本的佔領政策上，總部已經決定了大體的輪廓。在逐日的公事上，日本政府重要的施政，都要得盟軍總部的核准。原則上的指示，私人的建議，談話中的暗示，技術上的協助，自不免有相當的壓力和影響。大體上可以分三點來說（一）以政策穩定基礎（二）以核准的監督加以控制（三）對於政治，遇到重要的問題，才透露意向，由日人揣摩迎合，而加以絕不露任何形跡的運用（四）絕對必要時才公然干涉，例如去年二月禁止總罷工，是絕無僅有的。

總上五點基本因素而論，在「保守民主」的範圍裏，經佔領政策決定之後在左翼勢力尚一時不能取得政權的階段中，在麥帥總部的監督下，日本政局一定是保守勢力佔上風，而對左翼以讓步求平衡！客觀看來，這還不致於構成侵略勢力的死灰復燃！因為比起舊日本來說，畢竟是民主的。

換言之，日本政局完全在美國大圈子的籠罩之下。短期內決無重大的變化。可是在大圈子之中，却另有一個完全由日本人在活動的小圈子。

我們再來檢討這小圈子！

實行新憲以後，普選結果是社會黨第一，却未佔多數。一般預測以為麥帥未必許社會黨組閣，然而麥帥沒有這樣不聰明。當日本政黨之間，逐漸造成社會黨右翼和保守

的民主黨國協黨聯合組閣的局面時，他便公然讚譽第一黨的領袖片山，並且說中國蔣主席，非列濱羅哈斯和日本片山，都是基督徒，良足慶賀。因為他明曉得小圈子裏把社會黨左翼擠掉，這三黨聯合的片山內閣決不會影響到大圈子。前任總理吉田，以自由黨總裁的地位，退居反對黨的領袖。無疑的，他的方針是以退為進，不去糾合他黨，堅持反對片山。却坐着這聯合內閣的逐漸瓦解，徐圖再起。因為他也看清楚了，這大圈子裏足有他的機會，而小圈子裏已把社會黨左翼擠掉，他更不必擔心！

片山內閣的政綱是基於四黨間政治協定的。自由黨雖是反對黨，也參加協定。換言之，他不能改革，只能改良。上台不久，就抓黑市，懲貪污，提高道德標準，調解勞資糾紛，增產復興，想拉了大家往中間路上走。可是這內閣事實上為烏合之衆，難免貌合神離，不久就起暗潮。加以民主黨的政策，其保守性不亞於自由黨，完全代表資方。社會黨右翼的政策，雖不過小部份的代表勞方，民主黨也不肯輕易讓他去實行改良。結果釀成社會黨內部的紛爭，終至倒坍。

這小圈子裏的波動，雖然無關大局，却也錯綜複雜，極饒興趣！

本年十月，發生閣內閣外兩項大爭執：

第一，是工會對片山內閣攻擊。要求提高工資，不再以一千八百日圓為基數。至少要確保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足夠購買有二十四百熱量單位的食物。政府則警告必須維持現行基數，維持四千六百日圓（約合十五元黑市美金）的平均工資，以免物價與工資齊高的惡性循環。希望迅速解決工潮，努力生產，特別是煤產，如能達到年額三千萬噸，各種工商業都有甦生之望；為了全國都好，工人必須暫時忍耐。工會的反駁是政府只會說教，却不知道工人吃不飽，紛紛離職去經營黑市。自從投降以後，東久暹內閣密令將陸海軍物資大量放出，造成黑市充斥以來，始終無法制止。片山內閣，竟也不徹底加以撲滅，工人怎能滿意這名為社會黨，實是民主黨支持，掛羊頭賣狗肉的內閣？

政府逼得無法，只好解釋說這是社會黨力爭所得的聯合內閣。如果工人不合作，生產無辦法，只好下台。下台以後，恐無再起希望，對於這「最後」的「勞工」內閣，問工會究竟是否信任？工會的答覆是同情而不同意，所以既不能信任，也不來倒閣。

第二，是平野力三農相的問題。社會黨不但分左右兩派，就在右派之中，又有西尾和平野兩派互相暗鬥。西尾

拉攏民主黨，敷衍社會黨左翼，力圖鞏固內閣，儼然是片山的靈魂。平野有農村的勢力，以反共號召，力排社會黨左翼，暗中却看透了片山內閣將倒和久有關係的自由黨的吉田勾結，準備下次內閣時好分得一席。吉田當初在台上時，曾想組織聯合內閣，所拉的社會黨，本就是平野。這時候，暗中在準備組織保守新黨，竭力籠絡平野，以牽制同為保守勢力的民主黨。

平野屢次在閣內和西尾衝突，這時竟公然在外面宣傳政府不孚衆望，應該重行總選，再定新閣。西尾於是痛下決心，從舊紙堆裏找出一九三七年八月皇道雜誌中有一關於華北事變之聲明一文，援用追放法令，應由主編者平野負責。平野大怒，否認責任，拒絕辭職。西尾一不做，二不休，由片山將平野罷免。平野在追放審查委員會裏，幾次抗辯，情勢於他很有利。但西尾竟運用政治壓力，使今年一月最後的決定確定平野追放。追放是日本現在政治上最致命的武器。當初吉田想拆民主黨的台，就是用追放的手段削去犬養健，現在平野也遭同一命運！小圈子裏的鬥爭，照樣是窮兇極惡！

十一月又發生國家管理煤礦法案的大風潮。

這原是社會黨的一貫主張，有英國工黨的前例。但為了維持政權，竟採取了民主黨的修正案。修正案之中，強化企業家的權力，維護他們的管理權，少受政府商工省的支配，而勞工代表的權力反倒因此而減低。在國家前提的名義下，片面的確定了工人對於生產量的責任。這樣一來，社會黨內自然豪情激昂。結果，政府以准許發給工人因物價超過預定數字的生活補助金，來緩和反對空氣。

這樣的遷就，不但社會黨內反對，民主黨內竟還是不滿意，認為無論如何，自由企業的原則不該打破，國管煤礦，該堅決反對。民主黨黨田總裁，為了和西尾合作，竟也不惜高壓黨員，結果引起幣原系的脫黨。自由黨吉田乘機正式宣佈籌組新黨，以備取片山而代之。

西尾黨田，為了政權，結果兩頭不討好，反倒動搖了自己兩黨內的力量。先是社會黨右派排左派，保守陣營內民主黨擠自由黨。後來是社會黨右派內排平野系，民主黨內擠幣原系。這局面是維持不久的。西尾黨田還妄想宣傳自我犧牲，冀求一般國民諒解。沒想到輿論指摘他們半途而廢，首尾兩端。而民意測驗却驚人的表現贊成現內閣佔百分之廿四，反對現內閣佔百分之六十四。自由黨佔民意百分之廿一，高居首位。社會黨只佔百分之廿四，又退回次位。民主黨百分之十一，仍居第三位。

從十二月到一月，問題更多。

第一，閣內有預算之事。民主黨的藏相栗栖主張健全財政，不能多貼補工人，而要恢復通貨秩序。社會黨的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力主增加工人配給，救濟失業，赤字財政，實屬必要。在這爭論中，前者則代表政府的政黨，以爲專關民主，不能由藏相獨斷。並且主張停付公債利息，對於新圓（戰後舊幣凍結，另發新幣）存款，課以重稅，以補助財政收入，民主黨又大怒，指出這是違反政治協定的！社會黨又醜態取消政治協定，另訂新協定。左派鈴木茂三郎加藤勤十，並正式領導，向片山鄭重提出要求。這場官司，竟從閣內一直打到黨內。終於種下片山內閣倒坍的因！

第二，蘆田西尾繼續纏綿，結果却更使內閣內在的矛盾更爲顯著。蘆田向民主黨黨員演說，一點是現在勞工組織強化，因此非和社會黨繼續合作不可。不参加吉田的保守新黨運動。另一點是雖然和社會黨合作，却不使片山內閣，採取任何社會主義的政策。這番妙論，西尾不得不起來解釋，說蘆田這話不過是對他自己的民主黨內說而已。片山內閣鑒於時勢，將在二月改訂物價，並且考慮另訂新的政治協定，以滿足社會黨左派的要求。他對社會黨左派的批評，強顏承歡，譽爲愛黨精神。這是暗送秋波，想緩和黨內的反對力量。最後強調社會民主國協三黨，仍佔多數，內閣不會動搖，他剛說完，社會黨自己的閣僚，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立刻聲明，反對二月改訂物價。結果，這場官司又從黨內糾纏不清，再打到閣內。

這時片山內閣已經山窮水盡，內外夾攻。但竟沒有動搖，完全是因爲繼起乏人。自由黨仍佔少數。保守新黨雖在活動中，意外地受到一個打擊。隱藏物資在國會中被揭發了，牽涉到好些保守的老人。一時憤言噴噴，無從開展攻勢，但他們却另有陰謀，就是向後台老板的財東建議

，轉託他人出面，暗中去資助社會黨內各不相通的派系，使社會黨內自己起內鬨，起火併，自歸倒坍。這陰謀後來固然發生相當效力。至於被迫放的平野，雖然組織了勞農新黨，勢力也有限。共產黨本已無足輕重，內部復有坂野參三攻擊德田球太郎獨斷的內爭，談不到推翻片山內閣。所以片山內閣，雖然是支離破碎，竟仗着這小圈子裏的貧乏，苟延殘喘。而大圈子也仍舊希望他維持下去，以免左右重起全面衝突的危機！

第三，社會黨開大會，畢竟發生了變化。左派力陳民主黨所主張的產業復興，優待產業資金，獎勵儲蓄，避免統制，都不能使社會黨再維持合作。停付公債利息，對新圓財產課稅，改革行政，救濟失業，必須堅持。經過五日混亂的大會，雖有西尾熱辯，片山哭訴，還是左派的政策勝利。正式決議放棄政治協定。但黨內選舉的結果却仍是右派佔優勢。書記長淺沼是右派的。執行委員會廿九人中，十七人是右派的。可是國會中預算委員會主席是左派的鈴木，他却越出執行委員會，直接在國會中放了一炮，造成片山內閣的辭職。

國會再開，片山一篇空洞演說，舊調重彈，還是不凍結新圓，保護產業資金，力求增產，逐漸改善工人生活。鈴木就攻擊政府對於通貨膨脹，毫無有效辦法。過了兩天，栗野藏相提出追加預算，包括鐵路郵電加價。在預算委員會中，鈴木以主席地位，力加反對。民主黨貴難片山，要求他以黨魁地位，統率全黨，清算社會黨內左派的反對。社會黨內左翼同時也強硬表示，寧肯脫黨，決不能同意民主黨過份操縱片山內閣所規定的追加預算，雙方劍拔弩張，片山西尾弄得焦頭爛額。盟總一看不妙，由發言人解釋說追加預算，如在小委員會內否決，仍舊可以在國會全會中提出。這話是暗示整個國會中，保守議員多，想來可以通過的。但片山一想，社會黨已經失去許多人民的支持

，右派中平野系已經退出，如果左派再退出，這黨簡直無從維繫。既然山窮水盡，何必戀棧？辭職以後，還可彌縫黨內裂痕，重新統一，再看以後機會如何，於是日本根據新憲法產生的第一任閣，經過半年多的內外掙扎，終於瓦解。以仿效英國工黨自翻的社會黨，終以本身的不健全和各方的牽制，宣告失敗。

截至撰稿時爲止，尙不知後任內閣如何組成。（編者按：已由蘆田組閣）兩星期來，政黨間如狗搶骨頭那樣的亂，還沒結果。因爲沒有一黨是多數黨，而各黨黨內又分各派，其實是很複雜的多黨制，有些像法國那樣的。自由黨吉田想做總理，拉民主黨，而排斥社會黨。民主黨蘆田既想拉自由黨，又想拉社會黨右派，而排斥社會黨左派。却不肯讓吉田做總理。雙方爭持不下，一度曾有以前駐英大使宮內大臣現任參議院議長松平組閣的傳說。後來又有片山重行組閣的說法。大家都在東扯西拉，想造成一個平衡的局面。

新閣不知是誰，反正不是一個右翼聯合起來壓制左翼的平衡，便是中間團結把極左極右兩頭壓住的平衡。換言之，新內閣的性質不是像行憲以前的吉田內閣，就是像行憲之後的片山內閣。可能日本政局在三五年內，都不會跳出這兩種典型。而這兩種典型，不過是程度上，很保守或不太保守的差別！吉田也罷，蘆田也罷，片山也好，松平也好，反正是一「保守民主」。

小圈子裏的日本政局，波瀾迭起，決不會真正平靜下來。日本社會慢慢在發展、演變、生長。在短期內，大圈子籠罩了日本。但有一天，大圈子會慢慢放寬。和約簽訂，佔領結束，美國的控制力便比較減少這。時便要看看小圈子怎樣發展，怎樣伸展出一個新的大圈子來！

廿七年二月十八日脫稿

英國人看中國共產黨

Communism In China The Times, London, 12, Feb., 1948

(一)

一個中國政府的發言人曾經說過，在去年年初即可望將中共軍隊完全消滅。這個希望並未滿足，只是佔領了延安和山東的幾個海口，政府並未得到什麼。而共產黨，却

在另一方面，加強了他們在東北與華北的地位。大部分的「南滿鐵路」是被破壞了，有很長的幾段連鐵軌都被完全

運走。北平到瀋陽的鐵路曾被切斷好幾個星期，很長的部分幾被徹底破壞，現在錦州的政府軍隊處境極爲危岌，最近遼陽和盤山——兩個西南角上極重要的據點——失守，使瀋

陽的地位更爲孤立了。

在華北之南部，重要鐵路交點石家莊被佔以後，中共佈滿了河北更廣大的區域。在這區域內，政府唯一的功是保守了保定，但在幾個星期以前這城是極端危險的。現在，感謝孫連仲之被撤與傅作義的新職，國民黨不但保

住了，並且還佔了些地方。在山西，除了幾個孤立的抵抗據點外，全省都在共產黨手裏。他們攻佔了主要鹽業中心運城，但渡河政府軍宣佈已克復該城。（譯者按：倫敦新華社二月三日電訊，承認共軍於一月十一日自運城撤退，國軍五旅自河南渡河入運城。）

共產黨的力量曾經深入到了揚子江邊，津浦路時常中斷。河南幾乎被共產黨佔滿了，除了以鄭州為中心的這一片之外。在這個省分，曾有許多傳染病似的蔓延戰爭，政府軍會克復許多城市，但隨後隨失。山東半島據說曾有劇烈戰爭，而其西部則至今仍被佔着。在江蘇，散漫的戰爭曾經跨越長江，並且企圖切斷京滬之間的鐵路交通。

共產黨想從熱河進窺察哈爾和綏遠的努力是被決定的擊退了。但是湖北省的整個東北部是在一個最有才能的叛逆首領劉伯承手裏，他的軍隊已經切斷河北到武漢的鐵道線，現正向西推進中。在陝西的極北端共產黨渡過黃河，目下榆林周圍仍有大部共黨。

共產黨的力量，使它能够抗拒優勢兵力，優勢裝備的軍隊，而且甚至還可以佔領更多的土地。這有三個主要的原因：它的領導人物狂熱而起勁，通過訓練，服從最嚴格的黨紀。軍隊受良好訓練，受才能的領導。他們有些將軍曾在俄國獲有透澈的軍事知識，他們的作戰，特別在游擊戰方面，是卓越的。有時候他們的軍隊表現英勇和最高的紀律。軍隊中有普遍的同志精神，將校和士兵，在服裝、給養、和薪給方面，至少在理論上，是並無區別的。最後，人民對於國民黨的不滿和不安在有力的增長。經濟情況是混亂的。

(II)

「解放區」政府，——共產黨統制的區域——是他們領袖毛澤東的獨裁政府。協助毛澤東的是一個人數不多的委員會，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見他們設立分工的部，也沒有見舉行任何一種選舉。在不定期中，有時所謂人民參議會舉行會議，有地方領袖參與，討論政策，在目前，主要的是討論戰略。「解放區」的行政和訓令是由政委和宣傳家推行的，他們自己就是法律。一般的說，他們都是受過教育的男女，在莫斯科的東方人民大學（University for Oriental Peoples）受過特別訓練的。

共產黨政策中主要項目是土地平均分配的改革。中國土地改革法基本要點，包括大約十二條，主張「耕者有其田」，消除土地改革前的一切欠債，廢止現有的地產所有權，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土地重新分配制。領得配田者授與

所有權狀，有權經營，並且在某種條件之下，有權租給別人耕種。換句話說，土地並未共營，也並未收歸國有。這是共產黨最有威力的理論，希望因此而爭取全中國人口中的貧苦分子。土地重新分配制是用最武斷和強暴的態度推行的，全不注意該區域內農業上的必需條件。這個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把它當作一個合法的武器，用以破壞農民中的富有階級，他們是被共產黨認為最危險的反抗分子。除了分田和取消欠債以外，另一個清算富農的方法是「增加工資」和「減租」。增加工資是要追溯到以前的工資的，常常加成一倍或數倍，使僱主及其家屬盡可能付出最大的現款或實物，因而變窮。全部人民，要付出很重的各種賦稅。壯丁被徵為士兵，老弱則強迫勞工。

總之，在共產黨看來，他們政策之中較重要的部分是要實施馬克思的主義的。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統制人民全部生活的政黨。反對的言論和文字是不許有的。他們甚至鼓勵家裏的人做情報員，告發家中別的分分子。任何人如果被懷疑在批評他們的政府，即被宣布為反動分子，共產黨的領袖甚至干涉到家庭中最微細的私生活。婚姻習慣是改變了，女人可以和她所喜歡的人結婚。事實上，這也只是片面的，因為如她的追求者是一個紅軍或共產黨員，她也就沒有權利拒絕他。有些外國人，大都是聯總工作人員，常常稱讚共產黨員廉潔誠實而生活刻苦，比國民黨好。這種品格能否持久，只有待他統制了富庶的工業區如上海之類一兩年以後，才能證明。

(III)

他們對於宗教是在原則上仇視的，他們不能容忍加於人民的任何精神影響，除了他們自己的以外。佛寺和道觀被劫掠，廟產被充公，年輕的和倫被迫加入軍隊。他們對於天主教特別痛恨，因為天主教的嚴格訓練和廣泛組織成為他們的勁敵，也因為天主教的分布區域都是比較繁榮的，對共產對頑強抵抗。基督教會則幾乎不可能繼續工作。（譯者按：上星期四在英國某地舉行的東亞區傳教師非正式會議，其中有來自中國各區人員，據報告：該地教會工作照常推行，未受阻礙。）

「解放區」人民的反應很明顯地分為三個時期。共產黨初到一地時，因為他們的為人民利益的宣傳，軍隊的良好訓練，沒有土匪，分田政策等，人民對於這些戰勝者是歡迎的，假使不是熱烈的歡迎，至少認為比國民黨時代愉快多了。過了一個時期，不斷的開會和每一個人私生活的受干涉，使人感到厭倦。最後，農民發現他們的賦稅和以

前一般重，而且要被徵兵徵役，甚至受到以前土豪劣紳所加於他們的難堪，暗中都痛恨這種新辦法。中國人民是從心底裏生根的個人主義者，畢竟他們不能被壓下去，即使用最嚴酷的辦法，只有看將來了。

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是一個被蓋着的神秘。蘇聯政府直到現在為止，始終表現着嚴格中立的態度。共產黨中並無蘇聯軍事顧問之類。在內戰區中，也從未出現蘇聯飛機。關於蘇聯教官在滿洲訓練軍隊的報告，也許可能是真的。但有一點很清楚的，——雖然蘇聯否認——在蘇軍退出滿洲以前，他們或者把大量日本軍火送給共軍，或者把那些軍火留在那裏，使它不可避免的落在共軍手中。從共軍區域回來的外國人，又報告說那裏的中國人仍能得到一批批日本的或德國的軍火，是那些運小麥和大豆往蘇聯的貨船裝回來的。可以肯定地說的是：照蘇聯政府的一般政策而論，眼看這個親美的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困難，她是很滿足的。

毛澤東及其信徒是劇烈反美的，因為美國給南京政府種種道德上，物資上的援助，但這也並不是說，他們將永遠繼續一種親俄的政策，如果他們能獲得統治全中國的權力的話。他們是共產黨，但同時也是中國人。所以在判斷遠東的政策時，如果採用對歐的類推律，那是很危險的。在一九五到一九二六，國民黨本身就在蘇聯訓政之下，但在一年之後，當它自己覺得夠強壯了，它就對蘇聯朋友翻了臉。

目前這個鬥爭的目的，毛澤東和別的領袖們自己宣稱，在用游擊戰打擊政府的武力，在破壞交通和工業計劃，在切斷城市的補給線，而總之是在創造國內的混亂來打垮現政權。這些策略已獲若干成就，但前途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西部和南部的遼遠區域，現在還在衝突圈外。即使國民黨被迫放棄已失地域，撤離滿洲與華北，它仍有很大的資源可恃。（觀察特約記者譯）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在荷澤解放區所見

江 沙

民國三十五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得隨「行總」荷澤辦事處赴山東荷澤解放區辦理黃河故道移居人民的救濟工作，在荷澤前後住了三個月，所以對那邊解放區的情形，得見一大概。回京後，曾將所見情形，告與各方朋友，反應各不相同：「明哲」的朋友，都勸我少談為妙，免得被人懷疑宣傳「赤化」；與我不相熟的人，以為我留想「左傾」。我曾將所見詳情告訴梁漱溟先生，他認為我此行所見的是相當寶貴的。報導解放區內的真實見聞，原為今日一般人士所渴望，但際此時會，說話總覺太不方便，所以一直沒有寫出來。最近看見觀察三卷二十三期上譯載一篇「解放區印象記」，是「一個聯總工作者」的報導，倒也平鋪直敘，與我所見略同。但外國人因受語言的束縛，所見究竟不甚周到，因此我想把我所見的也追記下來，給大家多曉得一些解放區的真實情形。

入境時的印象

荷澤是我舊遊之地。二十六年夏我曾在那裏為山東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孫則讓所辦的訓練班講課，住了一個半月。那年八月一日，荷澤大地震，震了一年多，我親眼看見坍塌壓死許多人的慘景，城內的房屋都已全部震毀。所以我在動身以前，還以為荷澤仍是破破爛爛的。

我們是在三十五年七月中旬自南京動身的，在下關的中山碼頭，才和同去的共產黨代表王笑一交換了名片。他是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一的委員。他希望我們到解放區實地觀察，看看是不是和一般宣傳的那麼可怕。在浦口上車後，坐了一夜又一天的火車，在第二天下午到了開封，第三天在開封休息，第四天即搭乘河南救濟分署的汽車赴荷澤。

汽車經考城縣時，同行的兩個共產黨員告訴我們，說這裏是國民黨軍的前線，再過去一二十里路，就進入解放區了。

當我們的汽車進入解放區的第一個村子時，也並沒有特別的發現，只看見三五個帶着長槍的民兵，身穿紫花土布短衫褲，頭戴土布瓜皮式「八路帽」，十足的一付土腔。民兵向我們的汽車望望，却不盤問，就走進園子裏去了。開車的司機對我道：「他們就是這個勁兒」（意指這副土八路式的打扮）。

到荷澤是中午時分，我們被安排在「晉冀魯豫邊區政

府冀魯豫行署」內居住。我們到時，行署的正副主任、各科长、以及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都來招待我們。他們一律赤足，布鞋，紫花土布短衫褲，十足的粗壯勇敢氣概，與推江州車子的老百姓毫無兩樣。

二十六年七八月間我在荷澤時，城內是非常熱鬧的，有戲院、小脚娼妓、舊衣服攤、大館子、以及適合於北方人民的五金洋貨店。現在却不同了，妓女已經絕跡，從表面看上去，城內的市面比我以前所見的冷落得多，戲院子、飯館、洋貨店等都有，可是沒有以前那樣繁榮，尤其是洋貨店，簡直找不到胭脂口紅及其他比較名貴的化妝品；香烟只准販賣本地製的，上海烟和美國烟根本不許進口；布店內以出售紫花土布為大宗，綢緞等物雖然也有些，購買力却低得可憐。我訪問了我以前買皮鞋的店老闆，他告訴我：「生意已不如從前，皮鞋根本沒有人穿。」

我對我在荷澤的初次印象的內省，以為這並不是不好。我們要知道，以前之所以在表面上看得繁榮，其消耗者完全是屬於士大夫及紳士，說得「赤化」一點，以前的奢侈享受都是屬於吃農工們勞力的人。現在士大夫和紳士們都已被驅逐鬥爭打倒，就是仍住在荷澤的士大夫們，也不敢出頭而享樂了，所以留下來的，都是農人和工人，他們本來吸的是黃烟，現在仍吸黃烟，偶或吸上支把土產香烟，當然已覺非常奢侈。

但他們並不是不通人情的，我們到行署時，他們仍拿上海出品的大前門香烟出來款客，請我們吃大米飯（米在荷澤是不易買到的），請我們用洋火柴，點煤油燈。他們自己除款客時得揩油一支上海香烟和吃些好東西外，平時都吸土製香烟，用打火石，點青油燈，吃素飯，甚至吃高粱窩窩頭。

「他們」的生活

這裏所稱的「他們」，就是指解放區內的行政人員。起先我們朝夕接觸的是行署內的主任副主任及科長秘書等，與我們談天最多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主任王化雲先生，與荷澤市政府的市長們有時也在一起吃飯。我們在那裏是客人，伙食始終由他們供給，還派兩個通信員來服侍我們。我們的伙食，早餐是四樣菜，中飯是八樣菜，夜飯是六樣菜，都有大葷。而他們呢？高級幹部是四樣菜，低級幹部是兩樣素菜。據他們說，他們一年中吃不了多少麵

飯，大多時間須吃高粱。行總運去修黃河堤的洋麵粉，他們是吃不到的。

他們除由公家供給伙食外，並有衣服，一年照例是紫花布短衫褲兩套，黑布棉制服一套，布鞋若干雙，夏天不發襪，大家做赤脚大仙，冬天才有襪穿。男女是一律的，所以他們的女幹部是沒有長衣服穿的，與鄉下婦女毫無分別。

除吃穿以外，他們每月還有三十元「抗鈔」的薪水，這上至行署主任下至小通信員都是一樣的。好在他們大家都沒有什麼消耗，也過得很安樂。我覺得大家挨過苦日子，倒也沒有什麼。不像我們這裏，吃菜的見了吃肉的當然不順眼。

因此我們在那裏也非常難過，每逢吃飯時，大家總覺得吃得不好。他們對我們這樣殷勤客氣，有人說是手段，骨子裏是惡毒不堪的。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因為我們與他們本來沒有什麼分別，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被派去做事，他們當然歡迎我們，在人情上自然要招待我們。他們共產黨是反對我們這方面的政府，並不是我們這裏派去辦救濟的人。

他們就是大家一樣的苦，所以也就不覺得苦；公平真是非常可貴的。他們有些苦，有的我們真受不了。我看見住在我們隔壁房內行署司法處的人員，用木柴灰濾出來的水洗衣服。荷澤城內的澡堂在我們撤退前生意就清淡得被逼關門大吉，原因是他們大家洗不起澡。洋貨店內的香胰子還是十年前的存貨，可見他們生活享受之低。他們除喝的是開水外，用的完全是涼水。無論機關與個人，真是做到毫無浪費的境地。我回想起來，現在我們這裏在談節約，與他們相比，真是絕大笑話。

行政作風

我們因為起先住在行署內，所以對於他們的行政作風，也見了一個大概。簡單說來，他們完全講效率和目的，毫不講形式。所以他們沒有如我們那樣狗屁不通的會計制度和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程式。他們的會計制度，就是實收實支實報實銷，一切都是真的，見得人面的，相信別人是有人格的。決沒有同我們這裏的官廳會計似的，要造假單據假報銷。他們的公文，只求目的達到，就是偶有別字或格式錯誤，亦在所不計，決不像我們這裏一樣，一味咬

春城秋意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這正是農曆元宵左右，秦淮河畔的燈市，依然百態千妍，魚龍曼衍。南京人似乎還陶醉在新年的氣象裏，可是南京的政治圈中人物，已經掩不住內心的焦灼和憂愁，雖不是「教場猶奏別離歌」，却也禁不住的「沈腰潘鬢消磨」了。

作爲春天裏的秋天，南京的政海微波實自有其浮動變化的因素。

第一是和戰大局。在戰亂火熱，勳匪入雲之際，本來只有戰，沒有和。偏偏在臘尾年初之際，不知自那處刮來一股微風，也不知是那一國駐華的一位冒失官兒，透出一點「議而不和」的怪消息，給合衆社記者「歇斯底里亞」地尖叫一聲，把這個消息，在上週之末，報導了出來。湊巧的又碰錯了司徒大使的致詞「恢復國共談判」。正似流星一樣，這一切，馬上在人心巾掀起了波浪。到底能和不能和，其中底細，老百姓摸不着頭腦。無庸諱言，人心確是想和，但今日天下，

「人」早就失去了地位，還談什麼「人心」！這次的和議，到底什麼一會事，沒有人說得清楚。中國官場有句套語：「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件事，大概可作如是觀。

第二是東北的戰事，的確不如意料之佳。在軍事的算盤上，東北這一戰，本來是一個賠錢的生意，對中央只有負累。可是迄今無人肯說放棄東北的話。援助關外的本錢——兵源、糧食、又隨冬日以俱短，越拖越累，真可以說是已陷泥淖之中。這些本是原來的形勢，幾個月來，明明白白擺在眼前，只爲了東北的關內人吵吵鬧鬧，華北的紳民權要，幫腔作勢，認爲東北必須共存亡，因此無人肯作決定，也無法肯作決定！但自衛立煌接替陳誠以後，形勢日非，范兵團逆襲增援，熱河主席的寶座未登，錦西、遼左、都已岌岌可危。軍事形勢直

接刺激到政治經濟上面，大批游資自北南歸。有人說：「關內軍事廳接濟，關外游資打擊」，等於互換球門，這話未免刻薄，但也是實情。東北諸老來京後，臉上表情，迄仍沉重。政府雖有倚重之心，諸老已無自信之力了。以上兩點之外，最令南京人士不安的，是最高當局的一帖嶺毒春，一住半月以上。廬山本不容易叫人認識她的真面目，匡廬的政治氣氛，更令人嗅不出真正的味道來。街談巷議的「無稽之言」，不一而足，甚至說出華盛頓方面對我政治改造，單刀直入，有具體主張的提出，其內容能夠發生驚撼東亞大陸的新聞來。神經最敏的市場中人，反應最速，上海的一日三漲，有人說與此不無關係。所幸續稿之際，此種不安的情緒，已爲故宮機場的機聲鐵翼所澄清了。

據政治有經驗的人的看法，最近幾個月中的局面確實嚴重。首先是「行憲的負累」，這就是說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糾紛，與將來大選可能引起的政府內部分化。簽署代表與提名代表之爭，是象徵着國民

黨內「圈子離圈子」之爭。前者是非黨中央幹部的集團，獲有元老與其他人士的同情，即選舉總所，也是支持此派，因爲他們「於法有據」，後者爲中央組織一派所支撐，也是民青兩黨所繫望的。這個矛盾，迄今仍未解決。再加之李宗仁，子右任之競選，可能重返二十六年以前分裂之局。因爲桂系還是一部份力量，華中動匪，民衆自衛，表面上是有利於亂，實則未嘗不爲自謀！這件問題還小。最大的是軍事不受政治的控制，可能地造成十七年以來武人割據之局。首則破壞財政與人事的統一，繼則養兵自衛，虐民自選。要是不容他們如此，則他們將藉口於「勳匪」之受牽制；要是聽任他們，則行政院從此無權無責，只負籌財源，受勝怨的責任，中央便成了「周天子」！再次就是物價問題了。凡從前控制物價的法寶，這些時都已用盡，只賸下換新幣的最後一着。現在行政當局，已起草了一個劃分區分管理治的方案，是把現在各省軍治的局面合作化，看光景已經對現狀低頭了。

美援還無真消息。可判明者，是馬歇爾在台一日，必不予中國現當局以痛快。但中國政客們，正利用此作政治資本了。這幾天京中也有謠言，爲T.V.宋重握政權，張岳軍再轉西南，吳鐵城返粵，另一陳系軍人，接長台灣，以配合美援之有效使用等等。凡此傳說，真假如何，不敢預言，所可言者，即政治圈中，永遠是「換風換坐」。只能變，不能亂，最大限度還是搬搬座位而已！京中所聞，廣東建設消息，也漸漸露出貓腳爪來。原來他們所奉爲上賓的某美國公司，在本國並無資本，只是通過他們以獲得商業上之借款。大概此君，又是一「冒險家」，兩頭搗槍，從中漁利而已。

南京的春天，是這樣地淒涼。在春天中的行樂人物，却戰慄地，沉悶地迎接要來的歷史的日子——是情報方面供給的消息。烽火集團，選三月十九爲紀念節，那正是流寇李自成的生日。是真要把中國拖到「紅羊浩劫」裏嗎？聰明的現代統治者還會容有一甲申遺恨一嘆嗎？我懷念着歷史，我淒然地望著晚照的鐘山！

他們機關內既沒有浪費人力物力的公文，自然在表面上就清閒了。他們就可集中心力於幾件事。而他們辦事，依我的看法，也只有兩句話：辦不好或無力辦的事一概不辦，必須辦而辦得好的事，集中心力一定要辦到成功。因此他們沒有龐大的行政機構，不像我們這裏的因人設事，重床疊架。

開會，雖然我們的政府也開會討論，作風却完全不同，他們的開會，是坦白的、教育的、求有效實行的。他們在每發動一件事件之先，必須與每一個幹部假開會的機會都說通了，然後大家負責去做；做了之後，再開會檢討得失，坦白認錯，力求改進。這從服侍我們的通信員口中，即能知道。他們非常看重教育，而教育是從開會中得來的。這種教育，當然是共產黨化的了，其會議後的行動，自也以實行共產黨的政策爲目的。

我說他們的好處，讀者不要以爲我是在宣傳赤化；這正是我們所應當虛心學習的。我以爲誰能學習，誰就有前途。

他們的一套

我們都知道國民黨有一套法寶，叫「黨八股」。共產黨也有一套，也可以稱它爲「黨八股」。他們逢人要談，就談這一套，什麼歷史發展啦等等。不過，他們都是很誠懇的，在立場上毫無欺人自欺的成份。我以爲主義見解，見仁見智，各不相同，只要自以爲真實的就好。譬如說信鬼神的人，如自己真以爲確有活生生的鬼神，就真、就好、就有力量；如口內說有鬼神，心裏根本不相信，自己明白自己在騙人，那就是假的，就沒有力量了。我說他們好，就是他們確相信這一套共產鬥爭理論，真的相信，就真幹，所以有了力量。不像我們這裏有些人，嘴裏講得頭頭是道，而心裏滿不是那麼回事，自欺欺人，完全是用手段，玩敷衍，所以落得一個大家互相欺騙敷衍講面子的局面。(下接十五面)

晉南解放區的鬥爭情形

李子靜

(觀察西安通信)

去年三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犯了戰略上的錯誤，把晉南駐軍，調攻陝北，將晉南富饒的三十餘縣，換來陝北貧瘠的四五縣，種下了陳賚渡河，豫西動蕩、中原戰亂的後果。晉南自去年三月為共軍攻下以後，民間的確平靜，共軍所到之處，真是秋毫無犯，待人和氣，接物有禮，對任何人的身份、職業等均不聞不問，佔領一個城鎮以後，必以所得存糧，放散民間，同時將城牆拆除。如此數月，民間雖派沒有兵役也無，真是一個太平的世界。比之閻錫山的苛政，人民無不稱頌。後來人民解放縣政府成立，區政府成立，行政村成立(晉南共區組織，縣以下為區，區以下為村，村下以廿五家為閭，五家為鄰。)學校在名義上雖然維持，但因沒有經費，教員逃避，均漸次停頓。學生或為共方派往鄉下收糧，或作其他職務。接洽各區各村政治幹部派來，每村三五人不等，展開政治工作。大約幹部到村以後，每閭派一人，住三兩日。先找窮人探問本村本閭有那幾家人，姓名、職業、財產、身世……無所不問。村中各家清楚後，開始成立農會，以村中無產者為標準會員，然後將村中各家，按財產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等，再將每等分為三級(如富農分為上富農、中富農、下富農。)中農人家，即無入會資格。農會每晚開會，或一日開會數次。會議秘密，別人無從得知。會員亦不敢告訴別人。大致開會時，農幹員(專門負責村中鬥爭)講：富農的心如何毒，如何狠，貧農是受了富農的剝削而窮的，我來是為你們挖窮根的，現在到了我們窮人翻身的时候了，你們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每次開會，必須貧農報告：村中何人壞，何人有錢，何人幹過什麼公事。要是大家不報告，這個會便不散。討論決議，均由農幹員主持。農幹員要誰死，便於事前將打手安排，待召開村民大會時，打手們先登台

演講，說出被打者作過何事及挨打的原因，於是「木棍大會」開始，將被打者推於台上，亂棍齊下；將被打者打的血肉橫飛，腦漿四濺。又因農幹員讓報仇者可隨意使用嚴刑，故處死刑者有因上桿而死，有因用刀割死，有因用石砌死，有因火燒烙死，死刑之多，不一而足。至三等九級的劃分，標準隨地而異，總以確定鬥爭之標目為宜。富農為鬥爭的第一對象。大致富農均在封門之列。(封門是把富農的房屋用封條封閉，然後將其所有的財物分於窮人)筆者村中兩人稱地狹，富有者極少，但第一次封門者已有三十餘家。有一村民祇有百餘家，被封之家便有四十家。被封的人有並將其禁閉，嚴加拷打以至於死，即封飯吃仍不可能者。農幹員與村行政人員之職務，各不相干。晉南鬥爭現以村為單位，鬥爭由村農會主持，村行政人員概不能過問或說情。現村與村間人民幾不能往來，因每村皆編有兒童隊(或稱

抱腿隊)及婦女隊在村外站崗。見有生人即嚴加考問，除非帶有農會所開之通行證，絕難通過。所以今日晉南富農想逃亡出外者絕非易事。

共黨的鬥爭，極為徹底，不講人情面子，即其幹部的家屬，亦不能倖免。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習俗、禮教、人倫、宗教信仰、家庭組織、社會制度，皆在被剷除之列。晉南人平時認為正當的習俗，社會的士紳，今日無不成為鬥爭對象。處死民命之權，均操於各村農幹員之手，並無法律的根據，共區內尚無法官、法院、及律師的制度。由於鬥爭的進行，晉南各縣市面破爛人烟稀少，宛如荒村。最近由晉東南開來的新兵，謂其地目下已無可鬥爭，家庭組織已無，人人皆已成兵。此次(去年十二月底)攻運城之役，其兵源均來自運城附近數縣，據估計此次攻運城陣亡之人民，總數不下四五萬，其屍體堆積與城牆齊高。晉南土地，至今尚未分配，因鬥爭、封門、及徵糧、兵役等關係、土地大半荒蕪，貧農之家，亦無心耕耘，其他如生意，手工業，販運等各種活動，均早停頓。(二月十五日)

(上接十六面)

副主任的楚漢春氏，雖然琢磨透了學生的心理，跟學生一起吃飯，不擺官架子，舊曆辭歲買些花生給大家吃，但是不順心的事，依然不可避免，三日某校一同學因點小事犯了規，被楚氏開除了黨籍與學籍，引起了全體入黨同學的不滿，在營中犯規開除黨籍則可，開除學籍則楚氏並無此權力，因此他們羣起反對。這事究如何處置，還不得知：同時，還有一部分學生，未入冬令營的，即被認為思想有問題，天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二月一日入營典禮以前，東大本來已有幾個同學被捕，而在二月十四日的晚上，復有軍警直接入校捕人。最妙的是被抓去的學生大都是「聯委」，為什麼辦伙食的全是「共匪」，不是共產黨的便不辦伙食嗎？據說行轅想使那些未入冬令營的學生沒有飯吃，而這些「聯委」，努力向學校交涉，繼續開伙，所以由此一著。

(上接十四面)我們與他們談天，發現他們有一個看法，以為國民黨的政府負責人是毫無誠意的，所以和談雖在進行(那時周恩來尚在南京，和談尚未破裂)，但軍事上不能不有相當防範。當時我曾向他們表示意見，如大家真的開誠的談，真的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們也這樣想。有些人且對我們說：只要國民政府能真的實行三民主義，那一定是可以合作的。我聽了這句話很奇怪，就問他們：『你們毛主席在抗戰初期宣布與國民政府合作時，不是你們在宣言中說過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麼？現在國民政府既是國民黨的政府，而國民黨又是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標榜的，那末在見解上已有相同之處，為什麼仍要用武呢？』他們答說：『國民政府雖以三民主義為標榜，却不實行三民主義，所以我們要打倒它，讓中國真正的人民來組織政府，先來完成三民主義，再進而完成共產主義。』

修築河堤以便放水

在那裏與我們談天最多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化雲先生，他對他們的一套主義理論已經通曉了，所以每逢解答我們的問題，總是心平氣和的，很耐心的講解給我們聽。至於有些下級幹部，當然不免淺薄，不免機械，猶如聽飯桶牧師的傳道差不多。大體說來，他們的有一套當然比沒有一套好，他們的認真自信比我們這裏的敷衍自欺好。

黃河自二十七年河南花園口決口後，南流入淮，山東境內的黃河就變成了陸地，居民遷入河牀，楊樹亦已長成了。河牀內十歲左右的小孩，幾已不知道黃河這回事。我們這一批就是去辦河牀居民的遷徙救濟的，在荷澤共駐有四個單位：一是聯總辦事處，由外國人負責的；二是河南分署的倉庫，專管麵粉運輸的；三是河南分署工作隊，專管將麵粉發給修黃河堤的農民的；四就是我們這個行總衙門辦事處，是負責辦理河牀內居民遷出後的救濟和轉業的。他們希望行總撥一部物資或錢，換成各種工業機器，建設成為紗廠麵粉廠及火柴廠等，以供河牀內居民從業。因為有這樣大的理想，第一步免不了要調查。

這裏我不想談到我們的正式(下接十八面)

瀋陽冬令營的風波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從勝利到現在，東北的教育始終未被當局注意。所謂「復興東北教育」，只是一張「空口支票」，兩年以來，我們的教育當局對東北青年，毫沒有盡教育領導的作用。所以身居東北最高學府之位的東北大學，像一個癩老人似的，好歹蹣跚地從三台復員瀋陽，但是它却難免得越發一蹶不起了。朱部長北巡時曾指示復員學校中以東北大學最精，但是並沒指示什麼改善辦法，好像既然就讓它糟到底似的。會造就出很多醫學上人才的瀋陽醫學院(前奉天醫大)，始終在打着盹兒。杜聿明一手創辦的中正大學，隨着他的離去，陷入了半死不活的状态，現在終將步上解散的結局。其他私人辦的女子文理學院，被行轅封了門，遼東學院、河北學院、渤海大學等，仰仗學費度日的幾個學校，除掉因徵兵之故而「生意興隆」之外，簡直找不着更合適的詞兒來形容。

緊急的砍殺聲中勉強開了課。瀋陽上課較為正常。東大則自十月初開課後，拖了兩個多月，還沒完全就緒，便因煤電，欠薪等等問題，早早放了寒假。中正雖然拖到十二月底，但是教授始終沒到齊，有兩個掛着金字招牌，任教北平師大的教授，千呼萬喚，才請來瀋陽，但是一年的課，教了兩個禮拜便匆匆結束，急急忙忙乘飛機飛回去了。中正大學在杜聿明時代，可真不可一世，學生們除掉跟國立院校的學生享同等權利外，每人還發一身棉軍裝。但是杜氏一走，就像原來靠着牆的一隻破桌子似的，牆倒後它便晃晃搖搖站不穩了。

十二月中旬，陳誠將軍下了一道手令，中等的學校，一律於十二月底結束，在一手一腳的時代，各學校當然唯命是從，於是十二月底的時候，各大小中學，都先後放了假。但是那時東北的戰火正熾，有幾天瀋陽可聽到隆隆的炮聲，共軍會一度突入鐵西，給酣睡

的人們一個不小的刺激。所以各校的學生除掉了課。瀋陽有家的回家，或投靠親友的以外，大部分外縣學生有家回不去的，便都滯留在校中。他們終日浸淫在煩悶悲愁的苦水之中，也有一部分不甘沉默的人靜極思動，所以在一月初，東大中山中學便傳說有一百多個學生自動失了蹤。這事學校的訓導處想不出妥善的辦法來，當局也不能老裝聾作啞。同時傳聞瀋陽構築城防工事，所以陳氏與之至，便想到了舉辦冬令營。一月十日最高統帥蔣滯滯的時候，陳氏曾獲得當面讚許。一月中旬當地的報紙上便正式透露了舉辦冬令營的消息。並鄭重強調，入營的一律發給美式服裝，不入營的則免其公費，取消學籍。

關於冬令營的成立，曾有種種不同的揣測，姑妄記之以供參攷：一、防止學生前往「匪區」。二、萬一局勢不安，隨軍撤退至關內，改編為青年軍，施以訓練，充基層幹部。三、必要時協助警察維持治安。四、協同國軍作戰。以上幾項，祇是臆測。但有些青年為了怕真的改編為軍隊，不敢入營。在入營典禮時，楚溪春曾半開玩笑的說：「我雖予諸位以軍事訓練，但是決不敢把諸位開赴前線……」。然而實際上，這些臆測，也有相當道理。因為這項化費很大，要說在這種經濟支絀的時候，政府拿出一大筆錢來，沒有目的，那是騙小孩子的，若說專為了救濟同不去家的同學，為何以「所有在校學生，定要全體參加，不然便取消公費及平價米」來作威脅呢？

東北青年，雖然在情形特殊軍事第一的大帽下，對不合理的措施不敢有所抗拒，然而這一次他們却忘掉了「服務為負責之本」的手則，嚴厲不可侮慢的「手令」，非但沒生若何效力，並掀起軒然大波。手令頒布後各校的動態如次：

中正大學：因為去年十一月份起，便取消平價米，所以留校的同學，時時要為一天兩頓高粱米發愁，入冬令營不管其動機如何，炊食問題總可暫時解決，因此一開始報到，中正便有一百多個同學，首先入了營，雖然軍服並不是美式服裝，而只是粗布棉襖，但是也沒入計較那些了；那時東大瀋陽的同學，正為入營的事跟當局僵持不下，而中正的學生竟自動入營，所以大受歡迎。

瀋陽：他們有公費及平價米，日常生活過得滿舒服，大公報會計算東大瀋陽的一個公費生，每月可以拿到四十萬流通券，而一個大學教授充其量也不過拿到二十多萬(調整前的待遇)叫他們入營，便不啻是額外受罪，所以大部同學聲明不參加。後來陳誠將軍又重申前令，謂不入營的決定取消公費，毫不姑息，同時校方又與學生討價還價，於是同學的要求改為入營可以，但須不離本校。這給中間的校當局出了一個不易答覆的難題，同學既不體諒校方的困難，「手令」又急如星火，而一不離校受訓，「限於經費、人事、煤火等等的問題，又勢不可能，所以一直拖宕着。那時瀋陽與東大

許同學自由參加，如此在表面上亦無損「手令」的尊嚴，但是「取消公費」，雙方都沒再提，這也無庸深究，因為中國事，向來是會以不了了之的。這樣才算打開了僵局，入營的有八百多人，佔全體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這裏需要提一下的，便是東大有三個學生在友人家被捕。關於這事，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這三個人是黨團的叛逆，逮捕他們是要肅正風氣，以維綱紀。一說這是對堅持不入營份子的一種威嚇，透露出來的黑名單，共有十二人，現在是叫他們先聽聽風頭。

經過了以上種種波折，總算於二月一日舉行了入營典禮，受訓期間是一個月，必要時或有精神訓話，內容是三民主義，中國之命運，共匪叛國紀實等；軍事教育，講述如何戡亂建國，以及小組討論等。這情形對於專以解決伙食問題而入營的學生，能發生多大作用，不無疑問，但用心良苦，却是實在事。據說最初上課情形很不好，跟衛隊還時常發生衝突。身為該營 (下接十五面)



巴力門·電影業·中國出路

費孝通

傍晚同學們來約我們去看電影，在禮堂裏放映，片子是 Jean Ere。孩子高興得直跳，逼着她媽媽一定要去，我則因為這片子去年在倫敦的時候已看過，所以沒有去。一個人留在家裏，泡了一杯茶，想享受這一個黃昏的清閒。隨意的翻着新到的雜誌，在一月十日出的「新政治家」周刊裏，看到了一篇 Woodrow Wyatt 的「巴力門和電影業的獨占」。題目很惹眼，太太和孩子去看了電影，我正可看看這篇講電影和政治的文章。讀完了，我很興奮，很想就把它寄給張東蓀先生，因為這篇文章正針對着張先生最近在觀察上發表的言論。張先生在一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一文裏認為美國大可不必干涉美蘇之間那些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商業是商業，政治是政治。美國要做生意，這些國家站住了，生意不是更做得開闢了麼？張先生還提到英蘇之間的商約，主義不同的國家不是同樣可以做生意的麼？

張先生和我對於做生意一道都是外行。外行人看來，爲了要做生意而干涉人家政治，干涉結果反而破壞了市場，不是愚不可及麼？我也這樣想過，但是這一篇論英國電影的文章却告訴了我，這種看法未免有一點「外行」了。讓我犧牲這一個清閒的黃昏寫這一篇「爐邊天下」，談談現代生意經。

英國人是最自負的，但也有例外，例外就是電影。英國朋友們提起自己國產電影總是聳聳肩，表示毫無辦法。我倒替他們抱過不平，說英國沒有戲劇天才，是怨怪他們的，莎士比亞還不是英國人，巴利摩爾一門明星的原籍還不是英國？可是英國電影硬是趕不上好萊塢。說趕不上也不對，講品質，前年最優良的片子是法國的（那是據英國劇評家的公共意見，片名我已記不起來，是描寫巴黎優伶生活的），英國所出的一生死問題一，也夠得上很高的水準，但是一般的印象却總覺得影片非來自好萊塢不成似的。英國到處放映着美國影片。說來也夠使人驚心，英國在擴大輸出，節制輸入，尤其在金元荒的前夕，美金外匯流入好萊塢的數目，一九四六年，竟占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五。這數目是夠大的了，他們輸入的工業製成品也祇占百分之四·五。

一九四六年英國電影院所費影片的租金一共是二千六百萬鎊，減去其他開支，一千八百五十萬鎊是付給影片公司的，但是英國製片商所得却不到二百萬鎊，其餘除了極少流到歐洲去的之外，差不多全給好萊塢拿去了。英國政府對這個巨大的漏洞，早就想設法塞住，但是竟發現這比煙草和汽油更難控制。爲什麼呢？這裏我們碰着了現代生意經了。

英國一共有四千五百個電影院，其中大部分是一跳蚤窠，比較好的影院中有一千家是屬於兩個大公司所有：A·B·C 和 Rank。這兩家占有全國五分之一的票價收入。他們背後却是美國的製片商。A·B·C 公司是華納所控制的，華納又和米高梅訂有合同，一起獨占這家公司所屬四二五個影院的放映權。一年之內三十五個星期的放映時間劃歸了這兩家美國製片商。餘下的時間再分配於其他美商和英商的影片。Rank 自己製片，但是同樣受着美國製片公司的控制，他的老闆較多，聯合、二十世紀等都有分。老闆們多占有一定時間的放映權。這兩大公司和製片商更有默契，凡是他們放映過的片子不准再租給別家，別家放映過的片子，他們也不要。所以一個獨立電影院根本就租不着好片子，因爲如果一個製片商租給了他去放映，兩大系的電影院就會拒絕放映。Rank 每年自己製造的影片約二十五部，幾乎全部占據了他自己所屬影院放映美片之外的時間，因之他不必加緊生產，多了沒有用；而且所出的片子無論壞到什麼程度，一樣有放映機會，沒有競爭的。其他獨立製片公司祇有向 A·B·C 放映華納和米高梅片子所餘下的十七個星期裏去擠，非但英商之間競爭激烈，而且還要和美片競爭。如果擠不進去，祇有落到「跳蚤窩」的小影院裏去，買不起價錢。結果小的製片公司逐漸歸併到了 Rank 掌裏，到現在獨立的英國製片公司祇剩下了倫敦公司一家了。

在美國資本控制的獨占企業下，英國電影業是無法順利建立起來的。好的演員祇要一出名就坡好萊塢高價聘去了。好萊塢一手把英國影院放映時間占住了，另一手再把人才吸走，於是造下了英國影片實在趕不上美片的事實。每年巨額外匯像吸血一般從已經虧弱的英國經濟中流入好

萊塢。

英國政府當然不能坐視，於是着手要干涉了。巴力門開始向獨占企業進攻，他們利用政治權力想從這兩大系統的控制下解放各影院的放映權。新的「影片法案」今春即將提出，使英片有充分的放映機會。保守黨的議員又開始攻擊工黨政府，說他們干涉企業自由，其實誰也看得明白，英國人民早就沒有選擇要看什麼影片的自由了，這自由是給少數獨占企業所劫奪走的。工黨政府不過是想以政府的統制來代表少數獨占企業老闆們的統制罷了。政府統制和老闆統制有一些分別，也是相當重要的分別，前者在民主政治中是向民意負責的而後者却祇向外國的資本家負責。說起人民看電影的自由，值得在這裏再補充的說一下。我在上邊提到過前年最成功的那張法國片子，那時各報紙各雜誌都有好評，可是這張片子却並沒有在普通的影院裏放映的機會，祇在蘭斯特方場角上的一家價錢特別高的貴族影院放映，供給極少數花得起六先令以上的顧客們欣賞，一般的平民祇能在門外看着廣告。如果你祇想花二先令半的價錢去看電影，你是沒有選擇的，獨占企業早已替你排好。你唯一的自由是不看電影吧了。

英國工黨政府爲了電影成了外匯的漏洞，所以不能干涉了。我相信英國政府的力量是鬥得過好萊塢的，但是在這裏，我必須提出的是如果好萊塢的獨占企業要順利的做英國生意，工黨政府顯然是個討厭的傢伙。獨占企業果真和政治無緣，他們自然奈何不得英國政府。但是獨占企業早就防到這一層，他們也有政治勢力，那就是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可以通過華盛頓把壓力指向唐寧街——這是生意經，却也是張東蓀先生認爲大可不必的政治干涉。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美國的政治干涉早已領教過。鋼鐵國營案已決定延遲一年，今年不致提出了。爲什麼？代表英國鋼鐵企業說話的不祇是保守黨，而且還有美國人，司徒森警告倫敦，如果再鬧國營，不必再提借款了，甚至美國駐英大使也一直沒有對英國工黨的國營政策放鬆過攻擊。國營政策就是想以政府統制代替國際性的獨占企業的統制。現代生意經是離不開政治的，而且現代生意經是國際性的。我逐漸明白拋棄國家觀念的前鋒實在就是那些國際性的獨占企業。美國政府所代表的並不是美國國內的小商人，而是龐大的國際性的獨占企業。如果是爲小商人着想，張先生的看法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對於這些國際性的大老闆却不合。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必然是個以國家爲本位的計劃經濟，它不能容許不負責任的外國資本家來統制本國的企業，正像英國工黨政府不能容忍（下接十八面）



雜言

錢鍾書

關於著作的

作品遭人毀罵，我們常能置之不理，人家誤解了我們或根本不了解我們；作品有人讚美，我們無不欣然引為知音。但是讚美很可能跟毀罵一樣的盲目，而且往往對作家心理上的影響更壞。因為讚美是無形中的賄賂，沒有白受的道理；我們要保持這種不該受的讚美，要常博得這些人的雖不中肯而頗中聽的讚美，便不知不覺中遷就迎合，逐漸損失了思想和創作的自主權。有自尊心的人應當對不虞之譽跟求全之毀同樣的不屑理會——不過人的虛榮心（vanity）總勝於他的驕傲（pride）。

在斯賓諾沙（Spinoza）的哲學裏，「心」跟「物」（matter）是分清清楚楚的；他給「物」的定義是：只有面積體積（extension）而絕無思想（thought）。許多言之有物的偉大讀物都證明了這個定義的正確。

「先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先生，然後把講義哄過自己的學生，」這是我在一部小說裏所說的教授。我的老同學和同事們把這個頑笑當了真，紛紛責難，甚至說：「你們學文學的人也許如此，至於我們學歷史、考古、社會學、經濟等的人，那都是貨真價實，老少無欺，一點兒不含糊的。」我也覺得那句話太過火，需要修正。「先把圖書館的參考書放入自己寫的書裏，然後把自己寫的書列入圖書館的參考書裏」，這樣描寫學術的輪迴，也許妥當些。

任何大作家的作品，決不能每一部都好，總有些優劣不齊。這當然是句老生常談，但好像一切老生常談無人把它掛在心上。我們為某一種作品寫得好因而愛好它的作者，這是人之常情。不過，愛上了作者以後，我們每每對他起了偏袒，推愛及於他的全部作品，一鼓腦兒都認為聖經寶典，催眠得自己喪失了辨別力，甚且不許傍人有選擇權。對莎士比亞的 Bardolatry，就是個例。這可以算一專

家一的職業病（Occupational disease），彷彿畫師的肚子痛（Painter's colic）和女傭的膝蓋腫脹（Housemaid's Knee），專門研究某一家作品或某一時期作品的人，常有這種不分皂白的溺愛。專家有從一而終的貞節，死心塌地的忠實，更如俾士麥所謂，崇拜和傾倒的肌肉特別發達，但是他們說不上文藝鑑賞，正像沙龍的女主人愛好的是藝術家，不是藝術，或影劇迷看了明星，並非對劇藝真有興趣。

文如其人（Le sty, cest l'homme），這話靠不住。許多人作起文來——尤其是政論或硬性的學術文字——一定要裝點些文藝辭藻，扭捏出文藝姿態，說不盡的搔首弄姿。他們以為這樣纔算是「文」。文如其女人（Le style, cest la femme），似乎更切些；只希望女人千萬別像這種文章。

（上接十七面）A. B. C 和 Rank 去控制影片放映權的。結果新民主主義國家必然得用政治力量去打擊這些老閥，而這些老閥回過頭來，為了維持他們自身的利益，也不能不通過美國政府來壓迫這些國家放棄統制，這就是干涉。

要希望美國借款的國家，不容易避免這一類的干涉的，至於干涉到什麼程度，那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很可以說除非美國政府不受大企業老閥們的控制，美國為了生意經，不會不以經濟力量來打擊中間國家的計畫經濟的。他們說是說為了「貿易自由」。其實是為了私人統制，反對國家統制，（在不民主的國家中這兩種統制是不必分的。）

最後，我可以附帶說一下，張先生所舉英蘇商約來證明經濟和政治可以分開的說法，並不能應用在美國和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英國雖則祇有百分之二十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工黨執政之下，還維持着相當程度的計畫經濟。在有計畫的經濟之間可以成立單邊貿易的。英蘇兩國可以根據物物交換原則訂立商約。這一套辦法却是美國所最反對的，因為這樣做去，國際獨占企業就無從插足了。所以美國主張的是多邊貿易，政府不干涉商業，貨幣統一，關稅同盟，貿易自由。國際獨占企業必需打破國家主權，以往國家主權操在資本家手上，對於經濟的國際化，並不發生阻礙的。現在資本家在若干國家裏把握不住了政權，國家主權因之可能成為國際獨占企業的眼中釘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得所謂歐洲聯邦的真義了。

張東蓀先生所希望於美國的，在我看來，大概在最近期內是不會出現的，因為現在美國政府還是握在大企業家掌握之中。
二月十七日於清華勝因院

（上接十五面）
任務，因為結果是一場空。這裏只談一談我們到黃河堤上和河床內所見的情形。

第一件，我們去視察堤工，曾數次到臨濮集和董莊口一帶，去時由鄆城縣長劉傳朋同我們去，到堤上時，只見幾千民工正在堆土修堤，個個熱烈高興。據劉傳朋縣長告訴我們：「修堤時民工所需的麵粉依約定是由行總負擔的，但直到現在為止，運來麵粉，其數寥寥；現在所吃的，全由自己墊出來的。還有，花園口如果合攔放水，我們這裏的堤已修好無虞，但上流在國民黨手裏的縣份，却全未動工，所以如果放水，上流仍要開口，這裏要受到大害的。」劉縣長又說：「國民黨的報紙上總是宣傳我們不修堤好了沒有。」我聽了他這些話，深有感慨，因我深深知道，國民黨的大官們，坐在漂亮的辦公室裏，的確不知道黃河堤是怎麼會事。

第二件，我們去看看應被救濟的河床居民的生活。當我們的吉普開入河心內的村莊時，村內老百姓都聚集攔來，許多人都跪在地上向我們叩頭，求我們救救他們。他們大多已把房屋頂拆去，以備他遷。王笑一告訴我們，河床內老百姓如在花園口合攔後，得不到轉業救濟，那只有去行乞討飯。我因為好奇，問老百姓吃的什麼飯，老百姓就把他們的主要糧食拿了來：是高梁皮和着樹葉子做成的糰子，饅牛馬差不多。

第三件，調查河床居民戶口的結果。當時商討救濟河床居民的標準，是以人口為單位的，即每人給若干法幣。當時我們懷疑他們所報的戶口數字有以少報多之嫌，於是選定鄆城境內的河床區域為對象，印表調查。調查時，由鄆城劉傳朋縣長協助，派十二位鄉村師範學生給我們，先選定數村試查，把十二位學生教會，然後由學生分頭再去訓練區村幹部調查，數日內即調查完成；然後再由我們去覆查。覆查時，我們坐着吉普車去，一到村內，就打鼓集合村民，由我們辦事處的人員分頭逐戶查對，結果連年齡錯誤都沒有。由此可見其平日政令之貫徹。

可愛的老百姓

「老百姓真可愛啊！」深入過農村的先生們都會說這句話。在解放區內的老百姓，因為受過共產黨這一套的教育訓練，依我看，自私自利的觀念的確少到幾乎沒有，這當然是指天真的農民而言。老百姓幫助我們最多的是拉汽車。有一次，我們的汽車在赴舊城集的公（下接十九面）

觀察文摘

瀋陽觀感

原作者：梁實秋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九期

瀋陽很危急，四面的交通都斷了，包圍圈越縮越小。瀋陽的報紙都是官辦的，或是黨辦的，關於戰事的消息的報道一向是樂觀的，所用的術語都是從前對日抗戰時期後方報紙上用慣的那一套。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四鄉的難民（較為富有的）絡繹於途的向瀋陽逃，糧價飛漲，高出平津三四倍，滿街是乞丐，路邊上有的窮人舉着大衣求售，鬧市中有人成羣結隊的搶米，這一切現象都令人慌。最後，紙包不住火了，有一天夜晚的清晰的砲聲機關槍聲驚醒了市民的好夢，共軍的砲彈落入了鐵西區，午後四五時即行戒嚴，傷兵抬進了醫學院的中正大學，東北大學設了砲位。事實擺在面前，已經兵臨城下，一切宣傳伎倆都歸於無效。這樣危急的情形，到如今已經維持一個多月，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急。

東北的軍事已面臨着最嚴重的危機。由山海關到長春擺下了一字長蛇陣，雖然參謀總長兼行轅主任陳修爵將軍會經宣佈不但已粉碎了共軍的六次攻勢而且不准再有七次攻勢，但是共軍竟不顧陳兼主任的

「不准」而發動了七次攻勢，而且這次攻勢來得比哪一次都兇，遮斷了一切的交通線，幾乎每個據點都陷於孤立的狀態。尤其是神經中樞的瀋陽竟四面受敵。軍事情形是空前的惡劣，其原因所在不外下述數端：

第一，是估計的錯誤。軍方幾乎一致的意見是東北嚴寒中不會有大規模戰事。六次攻勢之後共軍需要補給修養，尤其是共軍裝備太差，衣裳單薄，似絕不能在冰天雪地裏作戰，所以如果有戰事大概是來春三四月間才能爆發。這樣的估計完全違反了「料敵從寬」的原則，共軍的裝備並不差，除了飛機之外，其餘是應有盡有的，服裝也相當好，並不像官方宣傳所說的那樣藍襪。並且天冷便不能打仗，這原則在過去軍閥內戰時可以適用，對於養尊處優的那種軍隊也許可以適用，惟獨對於共軍是不適用的。對於死都不怕的人，還能怕冷麼？此種錯誤估計是否已經貽誤戎機，固不敢確言，但軍方之大意疏懈是可以想見的。

第二，是士氣的低落。此次戰事中忠勇殉職的人並不少，但是就一般而論，士氣並不旺盛。我曾和交通警的官長們談過，他們是負責護路的責任的，戰鬥力是相當強的，他們說據守碉堡是白白送命的，外援不至，彈盡糧絕，只有投降之一途，投降之後並不被殺戮，逃回之後亦並不受懲處，如果戰死，撫卹却低微得可憐，所以誰也不願拚命，正式的軍隊素實當然也不一樣，以我所親知，少數的共軍輕而易舉的使守軍繳械的例子，確是有的。據一個收容傷兵的地方的護士告訴我，傷兵抬進去之後放在地上沒人管，多半是凍傷，沒東西吃，沒有水喝，他衣袋裏藏着新關下來的餚，五千流通券！在這樣情形下，士氣如何能旺盛？

第三，是兵力的單薄。軍事形勢的優劣，要看雙方實力消長以為斷。一字長蛇

陣把兵力分散開了，所以每一個據點的被困，都是在「匪眾我寡」的理由下完事大吉。為什麼不集中力量，以進攻為防衛？為什麼不早增派勁旅出關？為什麼不武裝民衆充實自衛力量？目前交通梗阻，情勢近於癱瘓，要挽救也不是容易事了。

以上所言，皆淺而易見者。如追究最後責任所在，東北一般輿論似乎對於參謀總長陳誠將軍不無微詞。平心而論，東北局勢之壞，不自陳誠赴瀋時始。自接收東北起，軍政人員一步一步的造成錯誤，都為今日種下了惡因。陳誠不過適逢其會，弄得焦頭爛額，幸虧有人接手，勉強下台。陳誠本人是清廉有為的，他有意作好，他努力以赴，所以他在東北曾一度大獲人心，認為頗有扭轉局勢之望。尤其是他懲治貪污，很得民心。但是他有重大缺陷。他的作風是絕對的獨裁的作風，他太自信，他太自負，他事必躬親，他不接近僚屬。獨裁作風再加上衙門積習，使得一切事都變得遲緩癱瘓。獨裁作風的結果是部下敢怒不敢言，一切敷衍，誰也不肯分層負責；一切推諉，誰也不肯賣力。在軍事方面便造成了一個消極局勢。陳誠以參謀總長的身分，居高臨下，睥睨一切，許多人都感覺得不舒服，他自己又沒有班底，要想指揮如意，真真乎難哉！凡是担當大事而出之以獨裁作風，在德國還可以，在日本也還可以，因為德日民族有那種服從性和那種紀律，在我們這處處講人情的國度裏便往往行不通，以致憤事。這是一般而論，並非專對陳誠一人而發。不過陳誠在東北的失敗，未始不在此。

論者往往以為東北之惡化一部分在於沒有重用東北的本地人。我很不同意。我一向沒有所謂同鄉的觀念。中國人即是中國人，好人即是好人，與籍貫無關。國家用人，只應求其能勝任而已。事實上東北人的鄉土觀念很重，而關內去的人又夾雜着不少的不爭氣分子，這是令人扼腕的

（上接十八面）路上開行，因路太鬆，四個輪子都陷在坑內，附近的農民見了，就自動的牽了三隻大黃牛來，把汽車拉上公路。又一次，我們從商邱回荷澤，載重的油車陷入公路邊鬆土裏，我幾乎把村子內所有的壯丁都叫了來，把汽油卸下，然後用牛拉起來，最後要送他們錢，他們却一文不要，且說：『你們來救濟我們，我們替你們拉拉車，怎能要你們出錢？』還有一次，我同三個外國人到商邱去，沿路看見許多民伕抬了小床。八個人抬一副，四個人抬，四個人跟着走，輪流換班。那時蘭封戰事很緊，我知道他們的任務是抬傷兵的，八個民伕只抬一個人。外國人看了好奇，取出開麥拉來拍照，我就順便問他們是幹嗎的。民伕們回答我道：『我們是去抬傷兵的，因為徵的多了，暫時回家去候命。』我說：『你們沒有兵監督你們麼？』『用不到的，為我們自己打仗，那裏還要兵來監督我們？』這些話，真使我們要細細體味才行。

王笑一曾告訴我們：『動員老百姓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不難，只要不騙他們，得到了他們的信仰，發生出來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又說：『同老百姓商量事情，一定要有非常的忍耐，要不拘形式，自由的給他們發言。許多老百姓在一起發言，起先不免吵鬧混亂，但你不要性急，過了一個相當期間，他們一定能想出一個方法出來，一定非常合理而有效。譬如公家的事，如限期修公路，發動民伕，徵發糧食和保存糧食，他們都會有辦法。大家商量出來的方法大家來執行，非但沒有弊端，而且沒有浪費。』這一段話，我認為對於我們政府裏的坐在辦公桌上擬方案的大人先生們，值得警惕和學習。我以為我們只要當老百姓是人，他會發揮出人的智慧；我們如當他們是狗，他總有一天會變成野獸來吃掉你的。

（本文下期續完）